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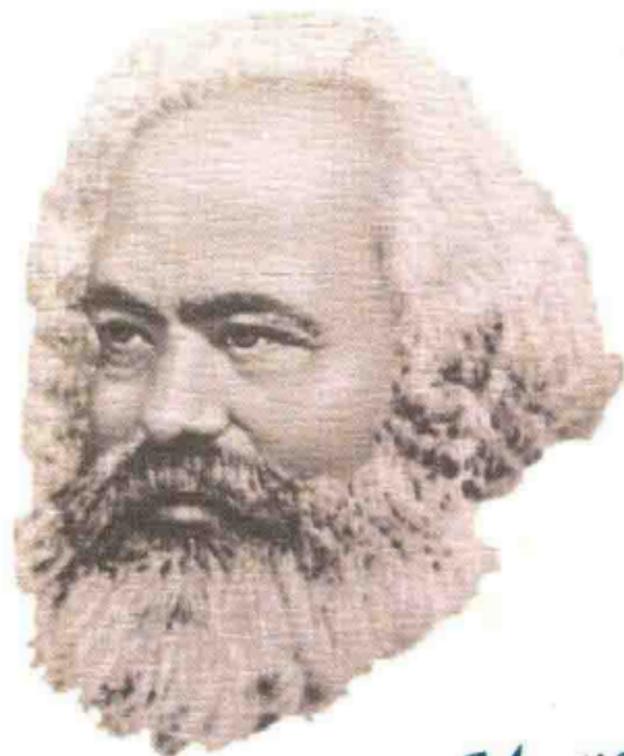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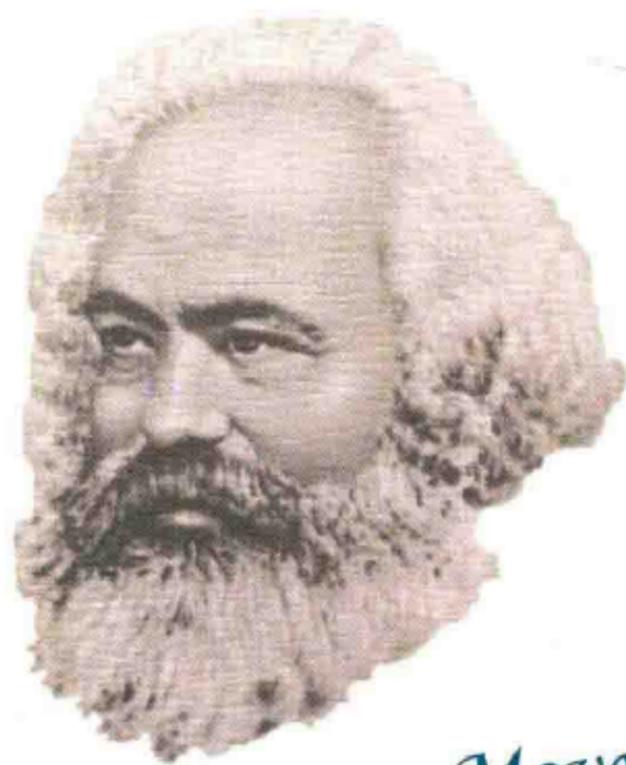
#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牙利]米哈伊·瓦伊达 著 ● 孙建茵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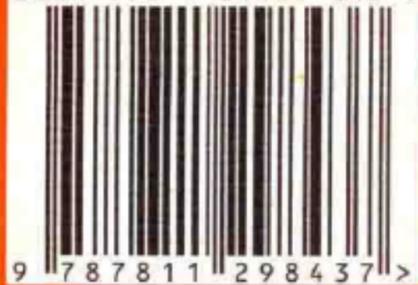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ISBN 978-7-81129-843-7



定价：32.00元



家出版基金项目  
CHINA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牙利]米哈伊·瓦伊达 著 ● 孙建茵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 黑版贸审字 08 - 2012 - 02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 (匈) 瓦伊达著 ; 孙建茵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843 - 7

I. ①作… II. ①瓦… ②孙… III. ①法西斯主义 - 研究 IV. ①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878 号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Copyright© Mihály Vajda

ZUOWEI QUNZHONG YUNDONG DE FAXISI ZHUYI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hály Vajda

ALL RIGHTS RESERVED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ZUOWEI QUNZHONG YUNDONG DE FAXISI ZHUYI

[匈牙利] 米哈伊·瓦伊达 著

孙建茵 译

---

责任编辑 张怀宇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7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43 - 7  
定 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sup>①</sup>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sup>②</sup>,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

---

<sup>①</sup>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sup>②</sup>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 年,“译丛”预计出版 40 种,“理论研究”丛书预计出版 20 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

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ć,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 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 )、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 1934— )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 )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ć, 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 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 1930— )、达迪奇(Ljubomir Tadić, 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 1923—1996)、苏佩克(Rudi Supek, 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 Grlić, 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 Sutlić, 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 Damnjanović, 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 )、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1999)、吉什(Janos Kis, 1943— )、塞勒尼(Ivan Szelenyi, 1938— )、康拉德(Ceorg Konrad, 1933— )、作家哈尔兹提(Miklos Harszti, 1945— )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

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

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 ljetnja Škola,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

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sup>①</sup>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

---

<sup>①</sup> 例如,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u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Essays for György Marku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等。

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sup>①</sup>、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

---

<sup>①</sup>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

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

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sup>①</sup>,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sup>②</sup>。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

---

<sup>①</sup>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II、II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sup>②</sup>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sup>①</sup>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

---

<sup>①</sup>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sup>①</sup>。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

<sup>①</sup>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tička revolucija—Očemu je riječ?* *Kulturni radnik*, No. 1, 1987, p. 19.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sup>①</sup>,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

---

<sup>①</sup>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4页。

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

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sup>①</sup>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sup>②</sup>。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

---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② 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ix.

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sup>②</sup>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

---

<sup>①</sup> Mihailo Marković,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vi.

<sup>②</sup>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sup>①</sup> 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sup>②</sup> 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sup>③</sup>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sup>④</sup> 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

---

①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例如, 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1994; 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m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③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④ 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于2009年去世。

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sup>①</sup>，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sup>②</sup>，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sup>③</sup>，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sup>④</sup>，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 20 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

---

①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59 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 2 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5、552 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90～95 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④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37 页。

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 and 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

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

“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 中译者序言

## 阶级分析与群众运动的起源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sup>①</sup>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主题。然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产生机制、历史罪恶、消极影响等问题却存在着迥然有别的观点。针对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什么、法西斯主义是否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否可以被视为同一等问题,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米哈伊·瓦伊达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共产国际、托洛茨基、塔斯科等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一种非编年史的、历史哲学的分析。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下,瓦伊达的《作为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淋漓尽致地借用并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在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响亮的、“颇具辨识度”的声音。

---

<sup>①</sup>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布达佩斯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研究》(14YJC7200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布达佩斯学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14D030)的资助。

## 一、瓦伊达的人生经历

米哈伊·瓦伊达(Mihály Vajda)这个名字可能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瓦伊达及其代表作《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1935年10月,瓦伊达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由于其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伊达无法和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其他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1944年的春天,瓦伊达和他的家人被强行要求在衣服上贴上特殊的标记以表明犹太人身份。不仅如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搬到专门分配给犹太人居住的房屋里。1944年秋天,瓦伊达和他的家人又再一次被强行送到了贫民区生活。但是,在那样受尽苦难和凌辱的环境中,瓦伊达和家人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逃过了一劫,但是历时几个月的大屠杀却在年幼的瓦伊达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能他自己都没能及时发觉,这段经历决定了他后来对于包括生活、生命等几乎涵盖一切的事物的态度。然而,在与瓦伊达的通信中,他非常确定地谈道,他能够肯定的事实就是,正是犹太人身份和法西斯大屠杀的经历让他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然而,成年后的瓦伊达在经历了斯大林模式的种种社会现实之后,尤其是匈牙利对这些所谓“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束缚和制裁之后,开始了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反思。用瓦伊达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在经历了生活中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后才形成的一种独立的世界观。

在布达佩斯大学求学时,瓦伊达学习了哲学、德语和文

学。1958年毕业之后,瓦伊达曾经在学校工作了几年。1961年,他在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7年,瓦伊达开始攻读哲学科学学科的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候选人资格,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92年他才终于在匈牙利科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从1956年开始,瓦伊达与阿格妮丝·赫勒相识并被引荐给卢卡奇,成为卢卡奇钦点的“布达佩斯学派”的四位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和乔治·马尔库什)。卢卡奇晚年带领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重新阅读马克思,力图通过回归真正的马克思思想而批判教条的、僵化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与卢卡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师友关系。因为,除了赫勒以外,包括瓦伊达在内的其他三位布达佩斯学派成员都没有直接做过卢卡奇的学生,而是在共同的研究中确立了学术团体的共同旨趣。除此之外,布达佩斯学派与卢卡奇的研究方式也不是单向的授课与学习,而是共同的研讨甚至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在《卢卡奇再评价》一书中,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回忆了他们同卢卡奇就其手稿进行研究的过程。书稿完成后,卢卡奇交给每一位学派成员,让他们在阅读后提出批评意见以便进行修改。这样的讨论五个人都会参加,他们会在每次讨论前将意见和评论交给瓦伊达,由他进行统合形成统一的阐述,再交给卢卡奇书面报告。正是在这样紧密的学术活动中,布达佩斯学派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共同的理论见解得以形成。

应该说,《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这本书就是布达佩斯学派思想在瓦伊达所热衷的主题上的一次具体实践,是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一次分析。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一道,瓦伊达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

动以及法西斯主义运动等角度入手,试图借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检验和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官方思想既不能接受瓦伊达的观点,也不允许这本书出版。他们认为,瓦伊达在书中的观点过于激进,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也隐含了对共产主义某些方面的批判,因此其被冠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的罪名。当时,布达佩斯学派的其他成员都由于各自的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瓦伊达本人因为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在1973年被解雇并且不允许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赫勒、费赫尔夫妇和马尔库什夫妇辗转移居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而瓦伊达由于家庭原因选择留在匈牙利。直到1990年,瓦伊达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并且不能发表任何著作。为了生存,瓦伊达甚至曾经在语言学校兼职教授德语来赚取生活费。在这段时间里,为了生活,也为了继续研究事业,瓦伊达以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等身份到过不同的国家和大学。最初是德国不莱梅大学,然后是纽约社会研究所新院,再接下来是加拿大彼得伯勒的特伦特大学,最后,他还到过德国的锡根大学。1989年瓦伊达正式恢复了在匈牙利的名誉和地位,他在匈牙利的德布勒森(Debrecen)受聘,被任命为科苏特·拉约什大学(Kossuth Lajos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一直工作到2005年退休。2004年他还受聘为卡塞尔大学的客座教授。2007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 二、瓦伊达的代表性著述

瓦伊达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作,出版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的著作,多达近20部。可以将瓦伊达的理论

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瓦伊达致力于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先后出版了两本专著,分别是1968年用匈牙利文写作的《“括号内的”科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科学概念的批判》(“Zárójelbe tett” tudomány. A husserli fenomenológia tudományfelfogásának bírálatahoz)以及1969年的《理性与神话的边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A mítosz és a ráció határán. Edmund Husserl fenomenológiája)。

中期是瓦伊达作为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开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著作基本都是他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批判。1976年用英文出版的这本《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其中的典范。1979年此书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1995年又被翻译成匈牙利文在布达佩斯出版。在这个时期,瓦伊达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涉及市民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1980年,他用意大利文写作的《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制度:东方的市民社会与官僚主义国家》(Sistemi sociali oltre Marx. Società civile e stato burocratico all'Est)在米兰出版。1981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著作《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文集》(The State and Socialism. Political Essays)。1989年匈牙利文著作《中欧的俄国社会主义》(Orosz szocializmus Középeurópában)出版,1994年再版,1991年被翻译成德文在维也纳出版。

20世纪90年代开始,瓦伊达的研究工作正式恢复,从这时起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研究,并拓展到文化、文学、政治等众多主题。在此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包括1990年的匈牙利文著作《马克思之后的解放,或我为什么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Marx után szabadon, avagy Miért nem vagyok már marxista?)、1992年的

《改变着的证明：通向后现代之路》( *Változó evidenciák. Útban a posztmodern felé,* ) 和《历史的终结？中欧 1989》( *A történelem vége? Közép - Európa—1989* )、1993 年的《后现代的海德格尔》( *A posztmodern Heidegger* )、1995 年的《人们可以期待什么：论费仑茨·费赫尔文集》( *Mit lehet remélni. Esszék Fehér Ferencről* )、1996 年的德文著作《文化批判主义的危机》( *Die Krise der Kulturkritik* ) 和匈牙利文著作《没有永恒：哲学(脚注)注释》( *Nem az örökkévalóságnak. Filozófiai (láb) jegyzetek* )、1997 年与乔治·马尔库什合著的《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卢卡奇文集第二卷》( *A Budapesti Iskola. Tanulmányok Lukács Györgyről II* )、2001 年的匈牙利文著作《镜子》( *Tükörben* ) 和《伊利索斯河岸会谈》( *Conversations on the on the Ilissos River Side* )、2003 年出版的《西方童话故事》( *Fairy Tales from the West* )。

除了匈牙利文、英文、德文之外，1999 年瓦伊达还曾用罗马尼亚文出版了专著，并在 2007 年、2009 年和 2011 年用斯洛伐克文出版了三部著作。不仅专著等身，瓦伊达还有大约 15 卷的论文是关于卢卡奇、海德格尔和匈牙利小说等主题的。因此，可以说，瓦伊达是一个研究主题丰富、涉猎内容众多的思想家。

### 三、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影响

瓦伊达被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 20 世纪下半叶围绕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等问题的国际化讨论。应该说，最初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是瓦伊达作为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学术身份。然而，使瓦伊达以个体身份进入国际学界视野的无疑就

是他的代表作《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就体现在这本专著以及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中。瓦伊达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反思的原因,除了他的亲身经历以外,与20世纪60、70年代的东欧社会现实和理论思潮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纪7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人道主义运动和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之中。为了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上对东欧各国的钳制和束缚,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强烈要求在社会层面上实行改革,并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冲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限制,重新确立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指导性地位。因此,在东欧各国中,高举“向真正的马克思回归”的大旗,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学术反驳。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瓦伊达在《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中针对当时官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反驳,批判了共产国际理论家对法西斯主义的错误理解,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局限性,批判了官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教条的、僵化的理解。

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紧密相关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反思。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但是,对这一险些将全世界引入灭顶之灾、用最极端的方式展现恐怖和暴行、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留下深深创伤的灾难和悲剧的反思从未停止过。卢卡奇用“理性的毁灭”来解读法西斯主义包含种族偏见、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的根源;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中的独裁主义性格机制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解析;阿伦特在对“极权主义”、“反犹主义”

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得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了自由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并对法西斯主义的“权威主义”人格进行了分类研究；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发现了法西斯主义所依赖的现代文明的基石。在这一潮流中，作为一名犹太人，作为法西斯主义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瓦伊达借用马克思阶级分析这一理论武器对法西斯主义运动展开了深入研究。

瓦伊达的专著《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不可旁绕的一种思想代表。在研究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多部权威著作中都有对瓦伊达思想的专门论述。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斯坦利·佩恩(Stanley G. Payne)的专著《法西斯主义的历史：1914—1945》(*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中介绍并引用了瓦伊达的相关理论。<sup>①</sup>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es)和德里克·林奇(Derek Lynch)在《劳特利奇指南：法西斯主义与极右派》<sup>②</sup>(*The Routledge companions to Fascism and the Far Right*)一书中指出，瓦伊达是匈牙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指出瓦伊达在《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中阐发了一种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他的理论贡献之一体现在他在书中承认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关联但同时又是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力量。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在《法西斯主义与欧洲右翼：1919—

---

<sup>①</sup> 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 632.

<sup>②</sup> Peter Davies, Derek Lync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s to Fascism and the Far Right*, Routledge, 2002, p. 432.

1945》<sup>①</sup>(*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一书中指出,官方的、共产国际所持有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公开的最反动的恐怖独裁、最沙文主义的以及最具帝国主义色彩的金融资本元素。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纳粹德国当作法西斯主义的样本而没有具体区分不同的右翼独裁形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不仅如此,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国家形式。这种理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许多欧洲左翼的理论家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比垄断资本主义代言人更为复杂的一种形式,是“阶级平衡”的结果。他们默许甚至帮助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在这些理论家中,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瓦伊达、霍克海默、鲍尔等都是批判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不仅如此,马丁·布林克霍恩还在书的最后部分,对包括瓦伊达在内的每一位理论家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著作和主旨思想进行了介述。戴夫·兰顿(Dave Renton)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sup>②</sup>(*Fascism: Theory and Practice*)指出,二战结束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框架内出现了一种趋势,不再强调经济对政治的硬性决定作用,而是在一种相对软化的意义上分析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在战后的众多理论家中,瓦伊达无疑是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代表。在由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主编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理论、原因和新共识》<sup>③</sup>(*International Fascism: 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一书中,瓦伊达的《作为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国际、托洛茨基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

① Martin Blinkhorn,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 Longman, 2000, p. 177.

② Dave Renton, *Fas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Pluto press, 1999, p. 160.

③ Roger Griffin, *International Fascism: 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 Arnold, 1998, p. 252.

Poulantzas)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著作并置,被编者列为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典范。在《谁是法西斯主义者: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sup>①</sup>(*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一书中,编者认为,瓦伊达与亚历山大·加尔金(Alexander Galkin)、尼克斯·普兰查斯等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除了这些学术专著,20世纪70、80年代,还有多篇专门研究瓦伊达这部专著的书评。例如1977年,伯明翰的大卫·埃德加(David Edgar)在《种族与阶级》(*Race & Class*)期刊上、卡特琳·梅耶尔(Katherine Meyer)在《社会因素》(*Social Forces*)上都发表了书评,评析了《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独特之处和局限性。1979年剑桥皇后学院的奥弗里(R. J. Overy)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发表了《第三帝国的阶级与共同体》(*Class and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一文。在文章中他综合分析了包括瓦伊达在内的四位学者的法西斯主义批判思想。从总体上认为,瓦伊达非常正确地将法西斯主义与欧洲两次大战之间其他传统的独裁主义统治进行了区分。这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著作,有的是法西斯主义理论导读性质的,有的是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角度的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将瓦伊达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视为经典和代表。

#### 四、全书的结构和主要观点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结构十分明晰,总

---

<sup>①</sup> Stein Ugelvik Larsen et al.,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Universitetsforlag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16.

体上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共十四章。第一部分的标题为“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在这一部分中,瓦伊达指出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并且吸收、聚集了中产阶级中社会地位发生下移的“破落”分子作为其战斗组织的中坚力量。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危机与出路”,瓦伊达在这个部分分析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反应或备选方案来应对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发生的变化。第三部分是“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政权和统治”。在这一部分,瓦伊达借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观点,把法西斯主义当作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基于一个根本原因:两种政治统治都是由一个经济权力依赖于政治角色的掌权者来实行的。

瓦伊达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写作《作为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是提供关于法西斯主义事件的编年史,而是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也就是要说明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瓦伊达的分析立足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根本立场,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的地位、结构、意识形态特征、历史作用等角度入手来寻找法西斯主义产生、兴起的根源。

根据全书的三个部分,可以将瓦伊达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首先,法西斯主义不是统治阶级发起的运动,事实上,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

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

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sup>①</sup>瓦伊达明确地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独裁的统治形式。法西斯主义独裁依靠群众运动上台,在掌握政权之后对传统的统治阶级施压并排挤。那么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呢?“群众运动意味着利益和意识内容移向大众层面。群众能够在其传播和表达形式中找到自己。斗争和行动形式上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最后,群众渴望自身处境的改变,渴望安全,渴望说明关系以及渴望集体统一的愿望得到清晰表述并得以系统化。”<sup>②</sup>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掌握了群众,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最终依赖这种群众运动登上政治舞台的。确切地说,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是大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上层与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结盟或者妥协的结果。因此,法西斯主义不仅不是由大资产阶级发动的,不仅不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反而在很多场合和重要决策上公开与传统的统治阶级利益相违背。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西斯主义掌握了这个欧洲社会人口最为广泛的群体——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曾经对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地位做出过细致描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

---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4页。

<sup>②</sup> Eberhard Knödler - Bunte and Russell Berman, *Fascism as a Depoliticized Mass Movement*,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11, Spring, 1977, p. 43.

监工和雇员所代替。”<sup>①</sup>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一直具有摇摆不定的特性。“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主要由感到生存受威胁的中产阶级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精英’是从没有任何稳定生存方式的阶层中招募的。”<sup>②</sup>这个由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岌岌可危的失业的白领、流氓无产者、农民等组成的群体在现行体制内感到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将自身悲惨处境的原因归咎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因此,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同自身利益相符合的因素,期望通过支持法西斯主义既保存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财产,又能恢复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现实和心理前提下,小资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力量。

其次,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总体性”为原则,反平等、反民主、反自由的非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必然宣称反对所有特殊利益对其他利益的优先权,而所有的特殊性都要服从“总体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在瓦伊达看来,这种总体性体现出一种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拒斥。因为,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理性主义的至高无上性,理性最终的胜利就是自由的实现,这是资本主义进步和发展中一直坚守的价值理念。这种蕴含着主体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理念成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否定的直接对象。法西斯主义用民族国家和种族的框架克服了一切特殊性的要求,它表现出一种不为保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保护所有人利益的姿态,由此将资本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法西斯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就简单地等同于不惜牺牲总体性而主张自己的利益特殊性,改良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目标也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② Mihaly Vajda,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Allison & Busb, 1976, p. 104.

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既没有资产阶级上层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工会组织的保护,因此才会在阶级斗争中失去自己既得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民族和自由同样怀有敌意。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小资产阶级对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仇恨直接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否定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精髓——民主与自由的价值。

再次,虽然在统治形式等方面具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是由于经济状况和阶级实力的差异导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不能被视为同一。

瓦伊达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后,意大利同德国的经济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德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而意大利只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在政治上一样软弱无力,它根本无力保障稳固的政治统治,也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条件。为了打开资本积累之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只能选择将政权拱手让给法西斯主义。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统治期间,意大利的资本化进程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

然而,德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完成了粗放阶段,稳步进入到集约型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资产阶级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多样的政治选择。换句话说,德国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面临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抉择。那么,德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呢?瓦伊达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国在当时急于推翻魏玛民主,建立一个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权,而能够帮助德国清除魏玛民主制度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半自愿地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这种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结果。

最后,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不是由这个阶层的经济实

力决定的,因此法西斯主义采取人为地制造紧张局势的统治策略以维持政权。

瓦伊达指出,法西斯主义独裁得以为继需要制造一种长期的、反革命的政治假象,制造人为的紧张状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垮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办法提供自身继续存在的依据。“因为制造这种人为的紧张状态在意大利对于经济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粗放阶段,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必为战争工业让路。)事实上这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因为与希特勒的联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丢掉了它的‘国家’特性,而这使广泛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国民的抵抗(national resistance)。这就是为什么与德国人截然相反,意大利人民大规模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覆盖的范围比与希特勒结盟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的原因。”<sup>①</sup>瓦伊达认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不惜发动战争来保证自己政权的稳固,根本原因仍然是与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关。由于法西斯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是由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一旦社会进入到平稳发展的阶段,经济上真正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上层必然会重新掌握政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sup>②</sup>。因此,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只有通过人为地为群众运动制造土壤,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并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

---

① Mihaly Vajda,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Allison & Busb, 1976, p. 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 五、对本书的评价与反思

《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一本十分有趣的“小书”。虽然篇幅不长,也没有过于晦涩的理论表述和难以理解的观点立场,但是阅读此书仍然需要基本的理论知识准备和历史事实储备。例如理论上,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批判、卢卡奇的“勃鲁姆提纲”、第二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等;历史上,凡尔赛和约、魏玛共和国、罗斯福新政等。此外,还要将这本书放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中才能凸显其中的理论深意和独特性。

第一,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体现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正如瓦伊达所言,他在写作这部研究著作时,赖希、弗洛姆、阿多诺等学者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这些代表性理论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性格机制、文化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的。换句话说,“社会-心理学”的法西斯主义研究理论在当时更为盛行。然而,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的,他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入手来找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正如他所言:“甚至对纳粹政权最残忍的和种族灭绝的手段,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归因于其领导者的施虐狂或‘疯狂’。这个政权自诞生起为了生存就需要这些手段。历史上‘通常的’战争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实现一些具体的目标而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除了战争本身之外的任

何东西。”<sup>①</sup>应该说,瓦伊达这种理论立场和研究是紧紧跟着马克思的思想和研究方式的,那就是从现实和经济基础出发。这一方面体现在,瓦伊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解读法西斯主义运动。瓦伊达不同意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简化的阶级分析,认为仅仅考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上台与小资产阶级发挥的主体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瓦伊达紧扣“阶级”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和关系进行了分析。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主要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由于没有实现彻底革命的坚定信念,因此逐渐瓦解。资产阶级上层只是想要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完全不在乎是否拥有行政权力,甚至主动把政治上的行政权交付给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被驱逐出再生产领域,是事业、生存受到威胁的群体,虽然不具有经济权力,然而他们需要政治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伊达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非常细致,从他们的意识形态特征到群体结构再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原因都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瓦伊达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瓦伊达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方法,将之运用到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之中。研究中,瓦伊达不仅大量借用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来分别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个体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在政治统治和经济权力上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行文中,瓦伊达多次使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在马克思看来”等表达

<sup>①</sup> Mihaly Vajda,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Allison & Busb, 1976, p. 122.

方式阐明自己的研究所坚持的理论立场。由此,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完全倚重马克思原著中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再运用、再阐释。

第二,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是对庸俗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反驳,体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冲破束缚、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理论任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研究上体现出一种共同的诉求,那就是通过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为本国实现一条自由发展、体现自身特殊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理论根基。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主题入手,对当时东欧官方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瓦伊达在这一潮流中,以第二国际为主要代表,反驳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和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当时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大资产阶级发动的运动,法西斯主义政权是资产阶级的傀儡。也就是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继续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工业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确定直接的关系,并由此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大企业的‘走狗’,充分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只能用经济学方式来解读”<sup>①</sup>。瓦伊达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马克思的分析提醒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对一个政权的实际状态和特点的理论检验必须建立在分析该政权涉及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那些实际掌控政治统治权和那些行使经济权力的阶级和阶层。他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政治社会学分析的任务不是

---

<sup>①</sup> Peter Davies, Derek Lync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ascism and the Far Right*, Routledge, 2002, p. 52.

简单地通过对财产关系的检验就可以完成的,财产关系本身并不决定制度的政治体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证明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出发点(完全与它是否证明了法西斯主义符合波拿巴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无关),因为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被社会民主政治和斯大林主义接受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否认的东西。事实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主要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有可能存在的(在法西斯主义之前的历史中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即拥有决定性生产资料的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sup>①</sup>因此,法西斯主义虽然与资产阶级上层具有某种联系,但是它夺取政权绝不是因为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瓦伊达的这种反驳实际上是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单线的、教条的决定论思想的一种批判。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共有的一种基本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权力可以自动地赋予一个阶级政治统治的权力,这样就将阶级关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因素。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将政治统治、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视为一个复合体。认为经济基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不仅存在政治的主导地位不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状况,而且政治上层建筑反过来还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说明了,一个不具有经济实力的政治统治集团可以迫使经济的运行做出调整以适应政治的需要。

瓦伊达的这些驳斥是非常有力度的,虽然他的论述是在法西斯主义批判这一框架内进行的,但是矛头也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他的批判力图说明,建立在同样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国家政

---

<sup>①</sup> Mihaly Vajda,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Allison & Busb, 1976, pp. 95-96.

权形式、政治体制也可以以多样性的方式出现。同时也隐含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反对一体化的政治模式的压制,应该立足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处境和阶级力量、结构的差异,建立体现本民族、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形式。

第三,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意义。无论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还是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家相比,瓦伊达的研究都体现出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完善和创新。一般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严格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的原理,用直接的、简化的决定论方法来理解法西斯主义现象,因此得出了法西斯主义是由大资产阶级幕后支配的运动的结论。另一方面,抛弃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众多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普遍采取了一种文化批判的方法,主要从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等角度来说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选择了更为多元、辩证的综合分析方法。他立足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分析的视角,他深入到德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丰富性和特殊性之中,在多样化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文化特征中,具体把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机制。瓦伊达所采取的融合了经济分析与文化批判、结合了历史史料与哲学思考、兼顾了宏观与微观视域的方法论,对于丰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瓦伊达的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有学者指出,瓦伊达以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在这两个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政治因素,然而,他的这种观点忽视了法国、挪威、奥地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力量和功能,虽然这些国家本国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最终没有得势,然而,这种忽略仍然是不应该的。<sup>①</sup>此外,在德国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掌权的复杂因素中,经济危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瓦伊达并没有对此投以足够的关注。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抹掉《作为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都不能掩盖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瓦伊达在书中的批判性反思对于冲破庸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重新理解马克思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围绕着对运动群众基础的阶级分析,瓦伊达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站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顾这本“小书”,不能否认,它无疑是重新认识法西斯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的一次有益尝试。

孙建首

2014年10月

---

<sup>①</sup> David Edgar, Book reviews: Fascism as a Mass Movement, In *Race and Class*, 1977(19), p. 213.

## 英文版序言

7

这本书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历史”研究。它不是对“发生了什么”进行描述。它也不是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或各种法西斯主义独裁提供一个编年史。确切地说,它进行了一次历史哲学的(historiosophical)尝试,试图探察所发生事件的含义(meaning)以及法西斯主义(既作为一种运动,又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与“市民社会”历史之间的相关性。它试图对一种虽然短暂却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主要角色的现象进行认识,并由此深入洞察“市民社会”自身的本质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国家”。整个分析势必遵循着看起来倒转的顺序进行。从“市民社会”的性质、“政治国家”以及马克思(Karl Marx)对这些复合体的分析出发,进而继续阐明法西斯主义的内涵和作用。但是,只有当这里所揭示出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含义能够为理解最先产生这一畸形现象的世界历史时期提供新的启示,并且能够为我试图说明这一现象的理论尝试提供基础时,这个分析才达到了它真正“隐秘”的目的。

我依旧坚持这种研究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以及几乎全部的细节(本书写于1969年到1970年间),虽然我并不总是

惯守表述这些观点的方式；否则我不会答应将其出版。尽管如此，我最初的理论立场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变。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观点本质上仍然深受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sup>①</sup> 我接受卢卡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即在“经验的”（empirical）和“被赋予的”（imputed）阶级意识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通过自身的行动而得到证明的、关于个体属于某一阶级的**实际的**（actual）意识，不同于那种所谈及的阶级个体**应该具有的**、作为其阶级属性的一种必然结果的阶级意识。一方面**8** 是实际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是逻辑分析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意识，这种两者间的对立导向了某种简单化。有的时候，我只能通过最详尽的那种理论建构才能把它们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相对接。在此，我无法试着分析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如果不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一种批判性的重新思考，卢卡奇的思想是无法超越的。

我想为读者简要指出我研究中的两个实质性的内容。首先，卢卡奇的思想无法提供依据来说明为什么“革命形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不能无条件地在每一次单独的“危机形势”下产生。如果“被赋予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声称是其阶级立场本质的逻辑结果的话，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在每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刻都能获得它？我在书中反复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潜伏着的危机形势的产物而非酝酿着的革命形势的产物。这样的形势如何并为什么能够出现仍是我在书中有待解释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试图通过早前革命志向的破灭来对此做出解释（按照

---

<sup>①</sup> 参见标题为“阶级意识”一章，载于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上述思想,这也不过是一种非解释)。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我书中最基本的和辩证性表述的一个主题。我的论述是这样的,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只有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现象才能被解释,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被视为一场实际上由统治阶级发起的运动,再者,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很明显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由此我强调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倾向中。但是当这种思想与我上面参照的阶级概念相联系时,就暗示着资产阶级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级。资产阶级表面上有志于向新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当资本主义的集约型阶段(Intensive phase)到来时],无产阶级致力于创建无阶级社会,而处于其间的小资产阶级则准备要两者“兼收”:但是当具体的历史形势既排除了前者也排除了后者时,那么小资产阶级必然变成法西斯主义分子。在众多原因中,我只能通过极其详尽的理论建构的方式将卢卡奇的概念移植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在完成了此书的写作之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和对“资产阶级”社会潜在的简化的阶级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国家”(Nation)概念的问题只是间接地与这一切相关联。尽管如此,它们仍然现实存在。我始终认为我在书中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国民性格的观点是有效的。而我目前的信念是,如果我们想要借由把握法西斯主义现象来深化对资产阶级世界时代的理解,那么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同样是必要的。

瓦伊达

1976年2月于布达佩斯

# 目 录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衣俊卿 1
中译者序言 阶级分析与群众运动的起源 .....	1
英文版序言 .....	1

## 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

一、法西斯主义独裁 .....	3
二、作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基础的	
“总体性”原则 .....	7
三、明确的国家特殊性的信条 .....	14
四、对自由的恐惧与对民主的否定 .....	21
五、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	24
六、作为组织形式的“作战部队” .....	37

## 危机与出路

七、“民主的危机” .....	47
-----------------	----

八、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	56
九、作为唯一选择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60
十、作为选择之一的法西斯主义(德国)·····	66
十一、为什么德国的资产阶级选择希特勒?·····	81

## 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政权和统治

十二、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	93
十三、意大利的独裁政权·····	109
十四、德国的独裁政权·····	113
主要译名对照表·····	13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近期出版书目

- 1.《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 编
- 3.《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匈]费伦茨·费赫尔 编
- 4.《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5.《激进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6.《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7.《卢卡奇再评价》 [匈]阿格妮丝·赫勒 主编
- 8.《超越正义》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9.《后现代政治状况》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著
- 10.《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1.《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2.《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3.《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14.《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15.《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6.《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章》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7.《历史与真理》 [波]亚当·沙夫 著
- 18.《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编
- 19.《人的哲学》 [波]亚当·沙夫 著
- 20.《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 著
- 21.《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 [匈]费伦茨·费赫尔 著
- 22.《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23.《道德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4.《个性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5.《历史理论》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6.《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27.《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亚当·沙夫 著
- 28.《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29.《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30.《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捷]伊凡·斯维塔克 著
- 31.《现代性的危机——来自 1968 时代的评论与观察》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小资产阶级的 阶级组织



## 一、法西斯主义独裁

法西斯主义独裁的显著特征就是发源于**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此外,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它要依靠这种运动获得支持。发挥这种独裁的权力功能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客,而是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我的研究方式确实显得有点专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每一种反民主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都必须被认定成法西斯主义,因此,人们可能期望有必要证明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当时所有其他独裁的特征,以便随之说明法西斯主义**运动**本身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然而,我认为这种专断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我已经慎重地选择将我的分析建立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立场之上。关于这一方面,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像匈牙利的霍尔蒂(Admiral Horthy)独裁这样的政权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national socialist)<sup>①</sup>统治是不同的。

当然,事实上霍尔蒂政权要晚于白色恐怖时期,那时反革命突击队(commandos)的暴行甚至不需要合法性外衣的

---

<sup>①</sup> 关于 national socialism,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译法,如“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本书选择使用“国家社会主义”的译法。——译者注

掩饰。然而,这是不同的,因为这种白色恐怖是对失败的革命、垮台的革命权力做出的反应;此外一定要记住的是,这种过渡时期之后往往会出现一种联合,其中传统的统治阶级仍然行使直接的政治权力——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此外,从我选择的立场来看,极其重要的是这种统治的行使方式即便不是给予其革命形式也是给了工人运动一定程度的自由。社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工会发挥作用;在联合时期,反共产主义恐怖通过合法警察和立法的方式得以施行。

- 14 可能有人会认为类似霍尔蒂的政权逐渐借用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特征。例如,在匈牙利,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反犹主义就变成了官方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地采用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因为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群众的要求——并不是传统的统治阶层本就愿意采取这些手段,因为他们惧怕所有类型的群众运动。匈牙利所发生的状况得到了早已结为盟友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尤其是纳粹政权)某些原则的默许。这些原则一定程度上符合传统统治阶层自身的意愿,然而更大程度上是同盟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直接或间接施压的结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其他非民主的欧洲国家。我完全同意奥托·鲍尔(Otto Bauer)的观点:

1918年革命之后紧接着便发生了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波兰的民主制度之后是毕苏茨基(Pilsudski)的军事独裁。在南斯拉夫,旧式王朝的军事专制主义取代了民主制度。新形式的暴政最先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了胜利。当然,在今天,被不同起源的反革命政府仿用的形式正是新近发现

的资产阶级专政。<sup>①</sup>

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早在 1923 年便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某些方面被许多其他的独裁形式所采用,最明显的莫过于西班牙的佛朗哥 (General Franco)。尽管如此,佛朗哥政权也不能被视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例子。我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为了证实我的说法我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西班牙独裁并没有从现行的政治权力中摒除传统的统治阶层。其次,哪怕在表面上它也不用被迫去满足激进的群众要求,因为它并不是依靠使用伪革命手段的群众运动上台的,而是通过革命力量公开的敌手,通过反革命而上台掌权的。第三,它不具有法西斯主义政权外交政策中的侵略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并没有发挥法西斯主义制度最具特点的经济功能:它没有助长反而相当明显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西班牙在 20 世纪 15  
60 年代确实开始经济发展时,政权的面貌开始在很多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这一事实尤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是那些权力由政党或其领导层行使,与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的冲锋队组织紧密联合的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前,这种运动致力于有计划地攻击工人阶级组织;其实力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增强,达到了无须与传统统治阶层实际联盟便可接管国家机器的地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运动不借助那些阶层的支持便可以夺取政权。只有现行政权心照不宣的支持才允许它在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攻击中违反现行法律秩序的规则。但是,一旦这一运动对掌控国家机器稳操胜券,夺取政权似乎——尽

---

<sup>①</sup> Otto Bauer, *Der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143.

管试图披上合法性外衣——将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改造。在意大利和德国情况均是如此，一个法西斯主义精英将传统的统治阶级从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中驱逐出去并且不允许他们组织起来反对。由于剔除了所有的传统政党和组织，它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体化的外观。

这种制度的建立要求一个从一开始就要在国家内采取一种反对“特殊”利益的立场，抨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己主义”(egoism)的政党。这个政党同样还要不偏不倚地抨击“财阀政治”、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自身的观点出发，它会毫无疑问地证明反对改良主义运动的正当性，因为改良主义(出于原则，不同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想要创造一个消灭特殊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社会这一目的)代表着无产阶级利己的利益。通过放弃共产主义社会改造的目标并且在现存体制中只是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而努力，它实际上是试图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这无疑仍然是特殊的，对立与其他别的阶层的利益。

## 二、作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意识<sup>16</sup> 形态基础的“总体性”原则

当一种法西斯主义独裁如此排除所有传统的政党(连同它们代表特殊社会阶层利益的独特功能)并建立自己代表“总体”国家的统治时,它便表现得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精神别无二致。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用最多样化的依据辩称法西斯主义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因为策略占了上风,并因此把所有其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都置于次要的地位。不过这只是想要把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纲领相混淆。当然,法西斯主义以最激进的方式毫不犹豫地修改自己公开宣布的纲领,如果其政权利益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它甚至不惜完全将其颠倒过来。但是,它从未声明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

将自己直接敌对的意识形态视为最纯粹的对特殊性的诉求,即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这是所有明确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的共同特征。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他指出,“斗争最初绝非开始于政治舞台,而是与19世纪的理性主义、个体主

义和唯物主义展开的一场哲学争论”<sup>①</sup>,并且在此方面“就连马克思主义(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看来)似乎都不断跟随着自由主义,好像是其后继者和伙伴一样”<sup>②</sup>。就像建立在特殊性上的理性主义一样,自由主义(连同无疑已经成为一种自由主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变体)是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敌对者。每一种真正自由的意识形态根本的和独特的意图就是要为不同的特殊利益创造一种理性的统一;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把工人阶级视为一种独立的和特殊的社会力量而对此做出了阐释,并且它寻求建立利益统一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统一中这一特殊阶级的利益将和其他利益一起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特殊性彻底的否定,意味着每一种特殊性都要从属于“总体的”、“天然有机的”整体——“国家”。

这种非理性的总体性与自由主义理性的特殊性构成直接的对立。“总体性”的这种非理性一直以来都补充着资产阶级思维单面的、扩张过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换句话说,始终或明显或含蓄地将非理性的一面引入资产阶级思维的正是总体性的立场。[资产阶级思维的这种结构及其与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最初是由卢卡奇延续马克思却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某些观点提出的。<sup>③</sup> 马尔库塞在这里的观点很明显依赖于卢卡奇的研究。]

自由主义“极其重要的”元素就是“理性最终胜利的乐

---

①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7.

②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7.

③ 参见标题为“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章,载于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观信念,它将凌驾于整体和谐中的一切利益和观点的冲突而自我实现”<sup>①</sup>。这种理性主义根植于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合理性”,社会关系合法调控的合理性与之相符合:

法律的合理化和企业的合理化(马克斯·韦伯证明,这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以一种无法预知的程度得以实现。但是恰恰于此,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遇到了自身再也无法超越的障碍。非理性主义元素开始渗透其中并打破了它的理论构想。<sup>②</sup>

“整体本身在合理化的范围之外”<sup>③</sup>,因而纵使从理论上,“整体的结构和秩序最终也要交由非理性的力量来决定:一种偶然的‘和谐’,一种‘自然的平衡’”<sup>④</sup>。随着阶级对抗的加剧和古典资本主义的危机,伴以“和谐”的反复坍塌,资产阶级思维的这些非理性方面必然要崭露头角。

马尔库塞正确地发现了典型的自由主义危机。但是他给出的预言“总体上独裁主义的国家促生了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适应的组织和社会理论”<sup>⑤</sup>却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垄断资本的稳定组织已经以一种受控的民主形式得到实现,而且现代实证主义就代表着与此相对应的理论。资本 18

---

①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6.

②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7.

③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7.

④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8.

⑤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19.

主义只有通过试图满足所有阶层的特殊需要才能稳固自身（由于某种或其他什么原因，当资本主义不能成功地达到这种无所不包的满足时，稳定总会被打破），而不是通过一般而言的虚幻的特殊利益的超越性来实现。既然马尔库塞把法西斯主义视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唯一适合的政治形式，那么他对资产阶级思维发展趋势的评判也是错误的：他把非理性主义当作现代资本主义中资产阶级思维最有特点的趋势。在法西斯主义时代中，马尔库塞不是唯一一个提出此观点的人。帕尔·尤斯图斯（Pál Justus）在《社会主义的道路：阶级战争的新条件》（译自匈牙利文标题）一书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趋势的相同观点，并且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也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思维发展的相同观点，在书中他把理性主义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视为现代思想进步与保守的分水岭。

然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塑造的”（ideologically shaped）态度，这种态度是由那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分界线所决定的。我之所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塑造的”，是因为，尽管事实上这种态度符合这一运动的基本利益，但是它产生了一种让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不可接受的让步。暂且不论其他方面，它使理论家忽略了一个已经预先公认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思维相互补足的两个方面。这种倾向在卢卡奇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某些著作中相当明显：那一时期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攻击并没有改变的事实是，他那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概念中的超理性主义（hyper-rationalism）。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没有被迫做出理论让步，并且他拒绝“反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在他的晚年他已经不再能

够对左翼运动施加任何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掌权时期,完全清楚的是,就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和计划而言,必然要联合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而这自然就意味着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必须成为理论同盟,因此理论斗争的实际分界线便画在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sup>19</sup>

最初在资产阶级的思维里,非理性的总体性观点似乎表现为总体性公然从属于某些优选精英的利益和立场[就像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那里一样]。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首次引入了一种变化,在一个既定的民族-种族的“总体性”(始终被视为是有机的)框架内,所有的特殊性似乎都被否定和克服了。[或许,对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沃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的“鲜血与祖国”(Blood and Soil)纲领。]公然愤世嫉俗贵族气的非理性主义绝不可能有机会实现真正的群众的影响力。而想要成为一种群众的意识形态,它就有义务摆脱自己的贵族主义而表现为某种“社会主义”的类型。毫无疑问,事实上这两种非理性主义的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履行着同一个职能: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正确地指出,在20世纪,排他性(exclusiveness)已经成为大众消费中的一项。毋庸置疑的是纳粹的宣传同样利用了这一点。但是,法西斯主义必须不能表现为那种旨在保护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对抗另外一个阶级的利益的社会主义类型,而是表现为决然对立于所有那些对某一个或另一个阶级有特殊诉求的社会政党的运动,也就是说,既对立于“资本主义”,也对立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性做出了非常清晰的界定:

它所提出的整体不是在阶级社会格局内由一个阶级的统治而实现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联合了

所有阶级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设想能够克服阶级斗争的现实,由此也克服阶级本身的现实……换句话说,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这个无阶级的社会是以现存阶级社会为基础并身处其格局之中的。<sup>①</sup>

法西斯主义不是对现存阶级社会的基础与格局的否定:因此,它很明显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反对自由主义(而且在这个方面还反对贵族气的非理性主义)并因此代表了一种虚幻的对特殊性的超越:由此它的本性是小资产阶级。而恰恰因为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搏,它的终曲。在这里,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我是在几乎无差别的意义上使用“小资产阶级”这一术语的。很明显,就在生产组织中的位置而言,不是所有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阶层都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的意识具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这就是我要接下来试图证明的事实之一。

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动摇现存社会的基础和格局是因为它没有否定私有财产的原则。同时,它能够影响到很广泛的人口范围,那些人要么感到在这个体制内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要么实际上已经被驱逐到社会的边缘,也就是说,他们在既定的制度中没有前途和真正的生存基础。这些“弃儿”自然在一场真正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变革下什么也不会失去。但是他们从事实中明白革命已经失去了直接的现实性;并且恰恰因为他们已经被驱逐而变成现在“丧失社会地位的人”,因此他们不具有集体意识和团结一致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这正是无产阶级

---

<sup>①</sup> Herbert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London, 1968, p. 21.

在历经数十年的集体战斗获得的。因此,他们不是为了现存社会的根本变革而是为了收复自己在其中的“传统”位置而斗争。

共产主义者的群众基础是由“原先的”失业者,即那些曾经在工厂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员形成,这一点绝非偶然(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意识,既然他们在这个给定的制度里生存得不到保证,那么他们就要为消灭它而奋争),然而“新近的”失业者——他们是被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多为农民背景并且通常很快就失业了——却加入了法西斯主义阵营。这个阶层(最底层的、没有阶级意识的“新”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也很乐意接受一种事实上只适合于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不像前者,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并没有丧失其生存的基础,但是它感到既受到了日益增强的资本集中的威胁,也受到了无产阶级有组织经济斗争的威胁。<sup>①</sup> 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欺骗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它保证了他们的财产权。此外,在它允诺给他们的未来中这种保证<sup>21</sup>是可实现的:维护作为“总体性”的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来对抗其他国家和种族。

---

<sup>①</sup> 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的加剧没有导向中产阶级的灭亡,这与马克思的期望是不相符的。例如,在当代美国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可观,甚至比重仍在不断增加。但是传统小资产阶级生存的条件——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生存条件——事实上已经遭到破坏,甚至正在走向尽头。后来的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中突破,其过程牵涉的社会妥协的元素越多,社会结构变革的崎岖与困难就越大。在这个方面,美国的情况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其人口的主体来自于上个世纪的欧洲移民,因此其社会结构很容易与经济变革的要求相适应。

## 22 三、明确的国家特殊性的信条

没有必要对法西斯主义中极权主义原则具有煽动性的欺骗本性做出详细说明。相当明显,任何属于既定国家或种族的人,与其他国家和种族相比,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构成。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个特殊集合的利益的表达必然采取非常残忍和侵略性的形式,因为它是公然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也因此是以明确否定那些基本价值为基础,而这些价值恰恰是资产阶级发展本身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每一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都是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使它们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是这种个体性。当它们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只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对所有其他利益的那些“市民社会”中的自私自利的人时,并且当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财产时,它们是不可能转变成“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马克思)这一意识形态的:

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

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sup>①</sup>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破坏了早前社会“自然给定的限制”,它才使“市民”得以存在。原则上,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上升到社会阶梯的顶端,从而废除了出身的特权,此外,它把个体——尽管是以纯粹“精神”的形式,以政治国家的形式——转变为类生活的代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sup>②</sup>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人的解放”。但是当这种人的解放“在政治解放的形式之下为自身实现而奋斗”时(也就是说,当它把人设定为脱离自身现实的类存在物,在孤立的领域、政治领域中的自私自利的物质存在),它便制造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使人的类生活变成纯粹精神的,通过使它从属于人的现实的、物质特殊性的方式获得解决:

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

<sup>①</sup>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and Moscow, 1975, vol. 3, p. 1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译者注

<sup>②</sup>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and Moscow, 1975, vol. 3, p. 1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译者注

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sup>①</sup>

1739年,雅各宾派小资产阶级试图让“资产阶级”从属于“市民”的尝试必然遭到谴责的原因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资产阶级和市民的二元性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没有消失,那么它将意味着对生活的废除,断头台永远存在。然而,“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也就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精神’要求);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sup>②</sup>。1922年法西斯主义小资产阶级运动和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运动意味着放弃了特殊的人的解放形式,这种解放要在至今存在的世界秩序的环境下(即资本主义)才最终具有可能性。它意味着完全放弃了1793年的成就,放弃了人的解放在“精神上的”假设。戈培尔(Goebbels)对于纳粹夺取政权的陈述是非常典型的:“由此,我们已经把1789年从历史中彻底抹掉了!”

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在1793年运动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性。这种可比性的现实社会基础体现在一个事实中,即小资产阶级试图在资产阶级社会格局内解决精神领域中的政治平等与实际的—物质的不平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尝试彻底失败了。但是1793年运动的倡导者通过把物质的平等(所有权的平等)与政治平等结合起来而竭力解决这一矛盾,而法西斯主义则试图把实际的—物质的平等(它

---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and Moscow, 1975, vol. 3, p. 15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and Moscow, 1975, vol. 3, p. 1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括号中的话为本书作者瓦伊达所加。——译者注

最有特点的永恒的口号就是反对非生产的、寄生的、“犹太人的”资本)与完全否定政治平等连接起来,也就是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才有可能的人的类生活的仅有的(精神的)实现。由此,法西斯主义宣告放弃了已经朝向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实现有所前进的资产阶级演进所取得的所有成就。

因为资产者没有从这种发展中受苦,恰恰相反却享受着这种发展的成果,因此他就丝毫没有兴趣看到其矛盾的消除。另一方面,拥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存在”(being-for-itself)的阶级,竭力通过终结资产阶级社会来消除其矛盾。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依赖它们的运动最典型的特性就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解决其最基本的矛盾;贯穿着这个社会的历史,这已经成为它们的特征。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发展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想要通过彻底实现资产阶级原则的方式终结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徒劳地要求实现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只是主张他们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它否定人的类本质,并且在法西斯主义阶段,它甚至公然否定那些资产阶级自身已经详细阐释的价值。

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偶然事件。这一点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国家”的“提升”,甚至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存在为代价,在它非常多样的、在其他方面总是发生根本改变的纲领中这是唯一固定不变的元素。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这样做已经很明显与他们的权力利益相违背之后,纳粹仍坚持这一原则。一方面是加入它及以它为代表的群众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能够使法西斯主义避免这<sup>25</sup>两方面发生冲突的只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假如这种冲突爆发,那么资产阶级首先就不会允许法西斯主

义夺取政权,其次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赢得任何群众的支持,因为它不能再充当(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定的敌手。此外,德国法西斯主义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对于群众来说并不只是某种廉价的骗局、宣传的标语。它表达了运动的本质。在这个词常识性的理解中它是社会主义:它宣称代表一个既定的国家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特殊利益(在满足所有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意义上),并且同时它必然是国家主义的,因为,不以否定自己现存的社会为基础,它只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的”目标。由施特拉塞尔兄弟<sup>①</sup>(Strasser brother)领导的德国法西斯主义所谓“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翼随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党翼的成长逐渐在运动中失去了重要性,这也不是一个巧合。注重把国家主义的思想 and 共产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也就是旨在废除私有财产,是无法为运动提供任何基础的。统治阶级不会接受这一点并且被迫要强烈反对它。可想而知这一翼同样也不会受到组成纳粹主义实际群众基础的阶层的欢迎,他们的目的是要保障他们那一点点财产并维护他们中产阶级的地位。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如果它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识而不是那种小资产阶级“造反”的意识,那么它是最不能够接受国家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那些最能接受国家主义思想的阶层一般而言都不具有革命性。

小资产阶级目的能够促生的不仅是国家主义的思想,还有其侵略性的表现。单是国家主权的防御是完全无法让“社会主义的”目标成为可能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非要保护自己人民的平等因而反对其他人民(尽管凡尔赛条约的“不平

---

<sup>①</sup> 指的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和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两人是德国纳粹党左翼的领导者。——译者注

等”正如影响德国那样对于纳粹主义来说是非常有利的)。<sup>26</sup>但是它必须为了专门满足自己人民的特殊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对资产阶级所保护的那些价值的否定(虽然只是在“精神”领域里),而首先就是对平等观念的否定。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当它制造了最明显的不平等时,仍然坚守着平等观念并且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方式保卫这一理念。当然,即便这种平等没有在实际中发生,哪怕只是原则上对它的坚持就已经代表了所有上述社会形态的真正的进步。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取消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倒退得更远,倒退到对基督教宣扬的平等理念的否认。优等种族的观念(这是为一个对立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家权利做出的简明“科学的”表述)是在既定国家中消除阶级冲突的手段,还要公然宣称人种的不平等。(当然,这种观念本身并不产生于法西斯主义运动;但是关于它的意识形态的详尽阐述属于直接的法西斯主义史前史。)

法西斯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国家不是最早的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而发动侵略战争的资产阶级政权形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它却是最早公开表明侵略扩张主义目的,反对生活在基本相同的经济文化水平上并且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内的那些人。资产阶级国家最野蛮的殖民战争最初是打着“教化”不发达国家的旗号发动的,其次就是反对在实际的经济和文化上体现出不可否认的落后性的那些人,他们的“劣等”不是被某些非理性的种族神秘主义而是被“事实”“证实”了的。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暴虐和肆无忌惮的残忍不是处于最高权力阶层的资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做出的“残酷”结果。法西斯主义的残暴来自于那些感到他们的生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威胁的阶层——并且不是因为它有可能被推翻——或者来自于那些沦落至社会边缘的人，他们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竭力在既定的制度内摆脱社会矛盾。至少在这个方面，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复加的表达式”（last word），是揭露其内在矛盾最残酷的可能性。<sup>27</sup> 它的残酷归因于一个事，它把为了生活、为了赤裸裸的生存而斗争的阶层中所有的“禁忌”都打破了——那些已经被平等的理想制造出来的禁忌（尽管只是在“精神”意义上），它们本身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

## 四、对自由的恐惧 与对民主的否定

至此我已经讨论了对资产阶级平等理想的放弃及其结果。但是法西斯主义还否定了其他基本的资产阶级理想，自由理想。方式是一样的。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对自由理想的否定似乎就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法西斯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民主与各种不同群体不惜牺牲总体性而主张自己特殊利益的权力视为同一。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被证明是有道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首先在于各种特殊群体可以自由地处理自身利益的表达这一事实，其次在于这些特殊群体的斗争和特殊利益间的冲突将产生一个最适合总体性利益的社会制度这一信念。由于出现了重要阶层的特殊利益完全被忽视的结果（尽管提倡的是和谐），法西斯主义因此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又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由于资本积聚的加强和拓展在数量上和组织上强化了工人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和传统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甚至是生存本身开始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中受到威胁。至少在意大利和德国，发展的趋势确实指向这个方向。原本属于这些

阶层的相当一大部分人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的只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世界大战导致了大幅度增长的破落分子；法西斯主义领导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些等级。）资产阶级民主似乎只符合两个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权力精英成员，以及工人阶级，因为它有部分得到满足的经济上的“特殊”需要而被整合到这一制度中。<sup>29</sup>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无法满足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像工人阶级借以奋战并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满足的工会这样的组织形式，尽管它曾经在经济上有可能维护独立的小型企业。工人通过他们的工会斗争，在这两个国家都能够为寻求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标准而奋斗并在现有情况下确实实现了。然而，小资产阶级却逐渐走向破产。因此，后者带着怀恨的愤怒转而反对工人阶级：穷人比小资产阶级本身生活得还好，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写道，法西斯主义“利用和组织小资产阶级的无责任感，以及它的怯懦和愚蠢，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发挥其组织力量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冲击中取得成功而对其产生了仇恨”<sup>①</sup>。

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一样，小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中失败的党派；它没有组织形式可以帮助它实现议会民主制所提供的机会。因此，小资产阶级转而反对民主；但是很明显它们继续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保留私有财产的原则。而这必然暗含着对所有种类的民主或自由的否定。

我已经说过，对资产阶级自由理想的否定呈现给我们的是与对平等理想的否定一样的方式。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就是对资产阶级实现自己自由理想的否定；尽管法西斯主

---

<sup>①</sup> Antonio Gramsci, Die italienische Krise,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378. 译自德文。

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性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它导向了对资产阶级自由理想本身的**明确**否定。法西斯主义是实际上废除自由理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是当它的利益需要限制自由理念时才在实践中简单地对之加以限制。

在资产阶级的自由(liberty)概念中,自由(freedom)专门修饰的是个体,按照常规意义:“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只要我有权这样做。”因此,对一个个体自由(freedom)的限制是由其他人的自由设定的。对他人自由的限制来自于自由的“市民”原则本身。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物质世界中,精神的、“市民”的自由理想意味着自由地限制他人。<sup>30</sup>

通过取消这种自由(liberty)理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无非就是宣布既定社会的真相并且揭露资产阶级世界中自由理想的虚假。它把这个社会真实的实践抬高到**原则**的位置。但是它也意味着从资产阶级世界成就中退回,这些成就已经沿着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路径不断前进(尽管是以矛盾的方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只是作为一种假设而存在;但是要否定这种假设则意味着要宣布放弃一个人类的自由有可能实现的世界。

## 五、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废除平等的理想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从法西斯主义运动参与者的特殊利益中推演出来。另一方面，放弃自由的理想，也就是不仅否定其他国家和“种族”的自由，也否定自己本人的自由，这种否定是有问题的，并且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学的解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

但是废除平等理想的“合理性”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合理性。用法西斯主义运动参与者的特殊利益就可以解释它；但是在这个背后存在着“社会 - 心理的”因素，正如放弃自由理想的背后也存在这样的因素一样。唯一的不同在于，当平等的理想被废除时，社会 - 心理的因素太显而易见了以至于人们对此已经熟视无睹。可以接受一种特殊的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是表现或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心理人格类型依赖于自己的或自己群体的特殊利益：在资产阶级社会，接受这种行为或意识形态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这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是“特殊的”人格，其性格结构的基础是“要拥有”的驱动，并且其持有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及其群体的物质利益。

另一方面,废除自由的理想还标明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个体与其群体的完全同一,自己的人格绝对屈从于“共同体”的利益和权力,对于视自我牺牲为理所当然的“元首”的无条件服从;相比之下,所有这一切,预设了一种**显然**与资产阶级社会正常个体**相冲突**的性格类型,因此似乎是完全“不合理的”。引起许多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者去思考其“社会-心理”基础的正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这一方面,运动参与者的这种特殊个性。

这并不是说只有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分析<sup>32</sup>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才不是试图借助社会心理学从总体性上解释法西斯主义,而是试图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就是努力描述和解释那些由于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才有可能产生,并且反过来使法西斯主义能够夺取政权的人格类型。想要从相关的个体或国家的“权威主义的”(authoritarian)性格中推演出法西斯主义本身的尝试在理论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里有一些书由于提问方式而从理论角度使我产生了兴趣:我指的是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Fear of Freedom*)<sup>①</sup>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d)的《权威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等。因为我的目的不是研究各种法西斯主义理论,所以我不想分析这些著作而仅仅想要说明,在某些方面,我并不赞同他们。

每一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得出的或含蓄或明确的结论都可以总

---

<sup>①</sup> *Fear of Freedom* 即 *Escape from Freedom*, 该书也可以译作《对自由的恐惧》。——译者注

结如下。形成法西斯主义运动群众基础的个体性格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只在法西斯主义阶段才产生的特殊的法西斯主义产物。它是社会中很普遍的一种人格结构,并且显现为每个时期和每个地方的中间阶层的典型的性格特征。当然,由于特定历史境遇,比起其他国家,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所必需的性格特征更容易在某一些国家的普通小资产阶级结构中出现,这很可能是事实。如果我们相信性格从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而非生物学的复合体的话,那么基本同一的社会结构能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实际上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不是要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并且能够在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典型个体中引起重要的人格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产生及其演变成一种群众运动的原因。如果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求它的话,那么在任何现代国家将都会出现其

33 成员的典型人格适于他们参加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阶层,而且是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不能从“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中推演出来:德国公民的“国民性格”与意大利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能够从中推演出来的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某些特征,尽管当我解释两种法西斯主义政权不同的命运和相矛盾的特征时我并不想使用这一特殊因素。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成员典型的性格特性中,哪些构成了个体参加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心理基础?关于这一点我想再次强调,中间阶层的地位并不单单是由,甚至根本上不是由他们在生产组织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决定的。既然性格特征是在童年时就形成的,那么小资产阶级性格特征形成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媒介就是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构成了孩童最基本的环境。如果家庭结构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那么负责供养家庭的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成长中的孩子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威廉·赖希著作最根本的价值就是他承认这一点并且把它阐释出来,尽管我不赞同他对性格形成“机制”所做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

典型的性格特征如下:

(1)一种对特殊性的关注:对自我的一种非批判的关系。一个人的需要、意愿和想法都不过是一些给定的东西。[关于特殊性的问题和“特殊人格”(particular personality)与“个体”(individual)的区分,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完全依赖于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的著作《日常生活》(译自匈牙利文题名)。]<sup>①</sup>

(2)特殊人格对自我非批判的关系往往伴随着对偶然给定的特殊群体也是一种非批判的关系。他所附属的这个群体,对他来说,就代表着人的类(human species):他完全认同其所属的(他的家庭、他的国家等)非选择性(non-chosen)的群体,并且把他们的价值标准当作“自然的”,当作唯一绝对有效的标准。他与这个“自然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延续到他与一个“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关系中:当特殊人格“自由地”加入一个偶然给定的共同体时,这种行为与降生在某个群体的偶然事件没有什么差别。一个真正认真选择出来的(即非偶然的)群体的从属关系的先决条件不仅在于我们在加入它之前就要正反两方面衡量,还在于即便当我们加入它之后,我们仍然对这一群体的价值标准和观点保持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能会出现各种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候可能导致采取一种与最初所选择的群体决然对立的立场,尽管最初曾经完全认同这个群体。然而,我们正在研

34

---

<sup>①</sup> Agnes Heller, *A mindennapi élet*, Budapest, 1970. 德文版 *Alltag und Geschichte*, Neuwied, 1970.

究的这种类型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似乎由他选择的群体价值和态度可能发生的所有改变,也由此显示了这种附属关系本身非批判的本性,当然,即使这种人格类型最后也有可能与他“自然的”或“准选择的”(quasi-chosen)群体决裂。但是转变往往是绝对的:从完全的认同陷入完全的否定。

(3)这种态度的结果就是“特殊人格”严格地将社会划分为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两部分。他把社会视为以自己为中心的或窄或宽的群体网络。他在所有层面上认同内群体,并且无论何时只要内群体目标的实现因某些原因而受到阻碍,他就会把责任推到外群体的身上并且转而竭尽全力地反对他们。一个拓宽的内群体网络的例子就是家庭—亲属—村庄—社区(共同体)—国家—种族。如果家庭的情况变得糟糕,那么亲属就是有责任,因为他们剥夺了家庭的继承权;对于自己国家的不幸,应该责怪的是周遭的其他国家,因为它们偷走了它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关于雅利安种族的问题则应该归罪于下等种族;等等。

(4)以过去为定向的保守倾向。特殊人格把自己成长岁月的“最初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家庭和国家)理想化了,因此毫无保留地接受它。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反对那些他认为应该为他的不幸负责的人或者特殊的群体(但是这仅仅是在他自己的要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否则他不会注意到他内群体的物质水平和地位的下降)。他总是<sup>35</sup>在一切人群中寻找——并且发现——替罪羊(这就是反犹主义立足的根基)。如果现存的结构有利于外群体,他的替罪羊的话,他也会反对这种结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为“最初的”结构复位而战。但是不管他的反抗多么激进,始终都是以过去为定向的。他不可能变得革命,因为这务必

要求对内群体“最初的”状态也保持一种批判态度。我把“最初的”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特殊人格关于家庭、国家或种族的“黄金时代”的想法往往与实际上曾经存在的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但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他自己家庭(国家、种族等)的状况上,这个黄金时代必须存在过,并且原则上必须是有可能最完美的一个。

(5)最后,是他的权威主义的态度。只有当他感觉到统治权力正在衰微并且推翻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即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权力时他才会反抗。另一方面他又藐视真正强势的力量,或至少看起来强于他的力量;他把它当作一种超然的(transcendent)权力——它的命令还没有被履行,它们必须得到履行。他把对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的所有责任转移到绝对权威上。但另一方面,对于弱势的一方,他又把自己视为绝对的权威,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代表超然权力的是他自己——他的每一个要求就是一个必须无条件履行的命令。

这并不是说上述特征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普通“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典型,也不单单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特征。不过,分析表明法西斯主义实际上熟练地利用了它们:更明确地说,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正是以这些特征的理想化形态作为基础。(法西斯主义领导者本身也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无须“虚构”一种迷惑和征服民众的意识形态。远非如此: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正符合他们自己的性格。①)

这些性格特征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运行不可或缺的,对于受控的伪民主来说也是如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sed irresponsibility)的社会]。然而,有一个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过的重要方面,它似乎是法西斯主义类型独有的特

---

① 参见 C. M. Gilbert, *Nuremburg Diary*。

征。一旦有冲突的情况出现,对于法西斯主义类型来说,内群体的层级似乎具有一种价值的等级制(hierarchy),而且他并不是无条件地认同那些更小范围的内群体。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内群体/外群体结构的逻辑结果应该是,个体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内群体的利益之前,更小更接近的内群体利益置于更大更宽范围的内群体利益之前:也就是说,在家庭利益面前他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保护自己家庭的利益,以此类推。但是这不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特性,至少不是大多数的情况。“笃信的”(convinced)法西斯主义分子是自我牺牲的。同样,他可以轻易地为了“国家”的原因转而背弃自己的家庭: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屡屡非常典型地互相告发,对于操控俯首帖耳的民众的那些权力者来说,这不失为一种非常方便的方法。

然而,在我看来,在冲突中决定内群体/外群体结构是否在这个方面维护自己的因素恰恰是环境,而非性格特征。权威主义性格在一切环境下都全部认同他的内群体;对于法西斯主义分子来说也是如此,这是出于一种成为杰出的父亲、母亲或孩子的道德责任,还有保护自己家庭利益而反对其他家庭的道德责任。但是即使当暴戾的铁腕权力攻击他最亲近的内群体,甚至攻击他本人的时候,他也不会反对它,这恰恰是因为内群体的等级制度不是一种价值的等级制度。而这并不只是法西斯主义唯一的特征。我们只需回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国家公民们狂热的自我牺牲就明白了。因为权威主义性格没有他自己的价值等级,他总是自动地认同其偶然给定的群体的价值等级。如果这些群体彼此陷入冲突,他就支持更强大更有力的群体的价值等级:他“选择”后者。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认同牺牲自

我,尤其当事实上他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自己的特殊性而行动?这种矛盾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而已。因为他没有价值等级,没有可以以其名义反对其“共同体”(即他所从属的偶然给定的特殊群体)价值等级的、自己的价值等级,也因为只有通过他的特殊的群体他才与人类发生联系,那么对他来说,对所有内群体的抛弃将意味着放弃他作为人的存在并<sup>37</sup>被逐出人类共同体,换句话说,即他自身的泯灭(annihilation)。这就是即使意味着自我泯灭(self annihilation)他也要服从最有力的内群体要求的原因。如果“最强大”的权力——对他来说是全能的——需要他的生命,那么他的生命也将失去,因为你不能与最强大的权力对抗。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没有基础。

我还没有讨论往往最先被探讨的法西斯主义的性格特征:残忍(brutality)。我没有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我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当作历史上同一的形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纳粹的残忍(它无疑超过了历史上残忍的“一般”程度)当作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特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独裁所施行的那种残忍暴行甚至在现代历史中自然也算不上独一无二,更不用说在人道理想出现之前的时期。关于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把某种特定的作用归因于国民性格。纳粹的残忍在人类暴行的历史上占据显眼的位置恰恰是因为它的有组织和“大规模的”性质。这种现象(当然,是历史形成的)与德国(主要是普鲁士的)国民性格间的联系已经被太多学者提到以至于没有必要再详细分析,在这里我只想请读者特别参看一下卢卡奇的论文《关于普鲁士》(*Über Preussentum*)。<sup>①</sup>

<sup>①</sup> Georg Lukács, In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Neuwied, 1967.

我没有详尽讨论残忍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不相信它是个永恒不变的特性。权威主义性格总是在可能性框架下用最残忍的方式反对弱者并以此维护自己内群体的利益。残忍不可能变成一种永恒不变的性格特征：它必须是**社会可容许的**。一个德国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可能一直是心地温善的父亲或丈夫；只有对待他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时他才无条件地残忍。并且即使在那些政治结构民主程度极高的资产阶级社会，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那些社会许可的法律和规范的关系中往往都是残忍的。

现在我要简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正在研究的“权威主义”  
38 人格类型是资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的特性及其增强的“机制”。

需要这样来说，我们刚刚考察的、以特殊性为导向的人格结构以及这种导向的直接结果（对于特殊群体几乎非批判的关系，将社会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普通人的特性，实际上也是“史前”人及其异化的社会生成的一般特性。在迄今为止存在的每一个社会里，个体性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一直是一个例外。虽然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行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老实说在其他阶层中间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社会完成了个体从社会共同体脐带的脱离。个体变得自由：他的出身不再必然地决定他的社会等级，不再决定他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也不再决定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社会流动性最低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即使此时流动性比以往的社会更高），任何人想要攀到顶点或是跌入谷底都是有可能的，至少原则上如此。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需要出众的能力（并不必然是具有积极价值内涵的能力）或者红运当头才能从他出身的阶层

脱颖而出,但实际上,个体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个体已经变得自由,他已经从“自然给定的”社会束缚中得到解放。但是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才能认识到这种自由。

另一方面,向下流动的危险对于来自社会统治阶级的个体来说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但是向下流动与向上流动一样罕见。如果一个人因其出身的优势拥有成功所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的话,如果出生在统治阶级家庭意味着他只需相对较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学识和教育,如果从孩童时期起他就对权力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如果他没能“功成名就”,他真的一定是被“赋予”了远低于普通人的能力。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可以约束其他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不必然是保守的。除了总体上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也就是真正的社会革命以外,没有什么变化是他们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的。他们能够承担风险: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才意味着泯灭或不幸。比起保守主义,“逐新趣异”(receptivity towards what is new)更是一般资产阶级上层成员的特征:毕竟,他们具有“创新进取”的精神。<sup>39</sup>

权威主义行为也并不必然是统治阶级的特征。他们认为没有权威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并且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充满自信,因此他们不需要依靠或者将责任转移到一种权威之上。既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也没有任何必要总是向低于他们的弱势者证明自己的优势。

并不需要很多的论证来证明,处于社会最底层、行为举止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既没有必要是保守主义的,也没有必要是权威主义的。他们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更高的权力能让他们的社会处境进一步恶化还是能给他们提供

充满希望的理由？无产阶级很快明白，比起适应资本家，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反抗他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武器。

因此，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行为只有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才是“正常的”、普通的。他们之所以保守是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在原则上赋予他们的自由；他们牢牢抓住既得的一切是因为这些对他们具有可靠的意义，并且他们也知道他们升迁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们的行为体现权威主义特征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完全任人摆布（远远超过了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对于在他们之下更弱小的那些人表现得像是权威的代表——不仅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无助，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身最微小的弱点或让步也可能导致自己垮台。除此以外，基于内群体/外群体划分的社会观点以及对应这种观点的行为，在中产阶级中体现得比社会其他任何基层都  
40 更顽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产阶级不仅反对高于和低于他们的阶层，还与自己同阶层的成员不断处于冲突之中。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工匠、小农、零售商们——更容易受到竞争的影响；“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处境也很相似，尽管情况有所不同。“白领工人”也必然彼此竞争。

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逃避自由”绝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普通个人”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特性。我完全赞同弗洛姆的表述：“如果人的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没有为个体性的实现提供基础……而同时人丧失了带给他们安全感的纽带，那么这种滞后将使自由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sup>①</sup>我也同意在 20 世纪，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感觉必然愈演愈烈：

---

<sup>①</sup>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个体无力感和孤独感越发加剧,摆脱了所有传统束缚的“自由”变得越发明显,但他获得个人经济成就的可能性却也越来越小。他受到巨大力量的威胁,而且这种处境在很多方面与15、16世纪相似。<sup>①</sup>

权威主义人格类型生成的“工场”就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人格的心理结构是以他“呱呱坠地”时就被给定的特征为基础的,并且在童年早期就已经被塑造和固定了;被给定的家庭结构确保了它从根本上符合那些保证既定社会秩序得以运行的客观要求。(这就是属于一个阶层的“典型”的人格结构也重现在其他的阶层中的原因。)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家庭结构决定心理性格的方式,或者形成人格结构的机制问题;关于这种讨论,读者可以参阅由阿格妮丝·赫勒与我本人合写的论文《家庭结构与共产主义》(*Family Structure and Communism*)<sup>②</sup>。

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依赖于一种以内群体/ 41  
外群体结构为基础,并且广泛存在于中间阶层的社会观;它依赖于他们的顽固和权威主义行为。对于法西斯主义与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也需要做出一点说明。我已经指出,在临时给定的情况下,这种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默从:远非如此。而它所蕴含的意味是,当中间阶层动员反对一种局面时,他们并不试图变革社会环境,而是责问应该为这局面“负责”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就消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群众允许法西斯主义欺骗他们。我并不是说法西斯主义领导者故意用他们自己也认

<sup>①</sup>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sup>②</sup> 见《社会主义人道化: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London, 1976)。

为无法实现的诺言误导群众,因为他们多半也自欺欺人。他们之所以欺骗自己和他人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希望实现的要求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本质上他们的诺言指向政治领域的变革(在资产阶级社会,一般来说,这几乎与群众无关),经过变革所有阶层继续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能力将得到保证,同时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将随之获得更多满足。法西斯主义领导者想要提升整个“国家”,并且不可能允许维护某一个阶级的私利而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为法西斯主义赋予群众影响力的正是一个事实,即它为保守主义的反叛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同样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

## 六、作为组织形式的 “作战部队”

这些体现小资产阶级内涵的观念需要一个架构,如果想要实现它们就需要一种合适的组织形式。作为一场小资产阶级运动,能够使法西斯主义发展到用自己的独裁取代自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程度的组织形式到底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清楚地证明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很明显是一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侵略性体现出中产阶级普通成员被强化的世界观和心理状态。被强化的性格可以通过突然增强的不安全感和一个事实得到解释,即大多数群众已经无须继续从事生产,变成失去社会地位的人(déclassé)。能够得到的证据显示,始于20年代初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其社会构成都是由“小资产阶级”群体组成的,也就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失去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不过,在农村形成中产阶级的农民在纳粹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法西斯的选民)。

法西斯主义运动创造了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当然不是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比起冲锋队(stormtroopers)

这样的武装组织,政党本身的作用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运动本身的性质不是由政党而是由武装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政党的工作是使运动能够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补充性地利用议会策略,因此也为自己获得一种重要的保守派基础。

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指出“冲锋队战术”(Stosstrup Taktik)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自突击队建立时起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就开始了。恐怕没有人能像葛兰西这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重要性,1919年他在《新秩序》(*Ordine Nuovo*)周刊的专栏中一直密切关注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形成。他不仅认识到这些冲锋队组建的成分、其功能以及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对它们的利用,他还意识到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

早在1919年的夏天,葛兰西就清楚地发现,如果革命运动发现自己无法把握群众的活动,也就是无法把握被战争引发的危机和战争中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集体经验驱动的群众活动并把它引入自己的轨道,使它转向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话,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假如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新的集体生活的机构之中,假如这些机构的活动能够使成果得以巩固,使经验得以发扬和丰富,并自觉地用来达到具体的历史目标,那么在战争年代中所得到的群众的精神成长,士兵们在肮脏的战壕里并肩度过的4年流血战争中所得到的对共产主义运动有益的经验就不致归于徒然。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将成为秩序和进步的因素。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可能开展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无秩序的乌合之众,就会被前所未有的和愈来愈可怕

的苦难弄到极其悲惨的境地。<sup>①</sup>

1921年,讨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西班牙事件(Spanish events)的经验时,葛兰西可能已经清楚地发现了这场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温床和目的:“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阶层的人口——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相信可以用机关枪和手枪解决重大问题,这个阶层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为其提供骨干。”<sup>②</sup>葛兰西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一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能够发展起来。他可能是第一个对这个问题给出具体答案的人,他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现了原因而没有满足于对危机局面、战后的瓦解或者因为战争破坏而发生的原本完整的社会阶层的分解进行简单叙述。毋庸置疑,后面的这些方面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其社会方位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改变的阶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最初,它加入了发展壮大的革命运动;但是品尝了革命失败的经验之后它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希望后者能够解决危机。然而,这些战争时期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是由小资产阶级阶层组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迫使他们放弃了最初的生活方式,而他们有意识地并且从一开始就反对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这些阶层无论如何都要拒绝一种真正的革命运动;他们不希望与任何一种无产阶级活动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是醒悟的革命者而只是小资产阶级造反派:

财富从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手中流向了资产阶级上层,无须生产设备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我

---

<sup>①</sup> Gramsci, *Arbeiter und Baue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38. [参见《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译者注]

<sup>②</sup> Gramsci, *Arbeiter und Baue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100.

标注的加重——米哈伊·瓦伊达)。<sup>①</sup>

因此,葛兰西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由战争时期的混乱和早已无法壮大发展为革命的危机而引起的,相反它是逐步展开的经济过程的结果。他最先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是由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产生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法西斯主义解释成战争精神病的结果,因此并没有对它采取足够的重视。他们倾向于认为一旦经济的运转回复正常,法西斯主义将会像它出现时那样迅速消失。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场有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感到自己惯常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但是只有超越对特殊国家的形势做简单的现象学描述,并且不仅把现象视为已经发生事件的结果,还要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待它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葛兰西正确地理解了资本不断集中的本质,并且意识到在意大利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已经变得越发无望,它已经不得  
45 不创建自己的组织。他还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是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一事实:

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独创性是在于它为一个社会阶级找到了合适的组织形式,而这个阶级向来没有任何结合的能力或统一的思想。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战场上的军队。党卫队于是成了**国家法西斯党**的支柱:人们如果不能取消整个党,就不能取消

---

<sup>①</sup> Gramsci, *Arbeiter und Baue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109.

党卫队。<sup>①</sup>

再没其他的组织形式可以这样适合于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不能为了保卫自身的经济利益创建这种组织形式。工会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罢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旦它发起抵抗,生产就会陷入瘫痪。但是小资产阶级无望的位置恰恰在于,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现代生产组织驱逐而出。(当然,在新资本主义结构中仍然存在中产阶级并且他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在很多方面“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都不同于“旧”中产阶级;从旧结构过渡到新的必然伴随着旧有形式的解体,更何况新中产阶级并不必然由旧阶级的成员构成。)

小资产阶级试图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组建一个政党的想法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一个政党想要成功,或者至少在议会斗争中有一些成功的希望,它必须有一些肯定的纲领,但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有这样的纲领,因为它害怕任何形式的改变,而且它的目标仅限于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它的纲领仅仅是一种否定: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

另一方面,“军队”和武装的作战部队与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参与者的性格都是相符合的。我已经论述过,建立在<sup>46</sup>内群体/外群体结构之上的社会形态必然把外群体视作敌对的、威胁性的力量。一旦小资产阶级发现他的命运正在变得不堪并且根基不稳时,他立刻开始为自己的困境寻找可以责

---

<sup>①</sup> Gramsci, *Arbeiter und Baue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153. [参见《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11页。——译者注]

备的敌对群体。既然危机永远存在(在那些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发现自己正处在下滑曲线的小资产阶级就会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把所有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相敌对的阶层、阶级、政党和个体都视为异己力量和异己种族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典型。

当遇到“身体上”受到威胁的危险时,作战组织很明显是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同时,加入这些组织的个体立刻就感受到有一种权威可以依靠,并且他们可以不用再承担个人责任。这种组织形式自然带给他们一种安全感、稳定感并且使他们可以在不用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情况下转向攻击所有那些他们感到威胁其生存的人。

这种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心理相符合的组织形式当然只能暂时存在,并且只能存在于危机局面中。但是在其他时候,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组织。在社会充分运转或相对没有摩擦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完全不想与任何人联合:在这样的时候他和家人一起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展开“竞争”。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冲锋队负责发现具有威胁性的社会阶层,首当其冲的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和无助的工人阶级;他们确实增强了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力量,使它能够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并能在战斗中获得足够的力量进而夺取国家机器。一旦小资产阶级运动夺取政权,它就会实行资产阶级纲领(或者至少是部分资产阶级纲领)而不是它自己的,这一点可以很容易从一个事实中得出,因为除了夺取政权它没有其他纲领。<sup>47</sup>更确切地说,当小资产阶级运动实行侵略性扩张的纲领时,它代表的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是一样的。然而,这与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本质有关而不是运动的本质。

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以及这种特殊的运动形式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合适的组织形式这一事实依然存在——尽管,法西斯主义确实一度夺取权力,却并没有实行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目标”。当运动刚刚兴起时,它曾以相当明显的有利于资产阶级权力的方式来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即便这一事实也不能改变这一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本质。这就是我不同意安杰洛·塔斯科(Angelo Tasca)得出的结论的原因,他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sup>①</sup>在其他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增添了重要内容。因为与工人阶级对抗,法西斯主义更偏向于资产阶级,以此为依据塔斯科否认了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sup>②</sup>不可否认法西斯主义偏向于资产阶级。但是,我始终坚信,只局限于询问一种特殊的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这样的社会研究往往被证明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立场对任何一种社会形势展开具体的分析。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分析法西斯主义是否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因为毕竟这种论述对于任何不想通过革命方式推翻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运动来说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它是如何为那些利益服务的。在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如何”这个问题恰恰要由其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来说明。根据塔斯科: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反动,但是这种反动却在战后形势中使用了唯一有效的群众方法……然而,从一种特定观点来看,法西斯主义在以损害

---

<sup>①</sup> Angelo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sup>②</sup> 参见 Angelo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 343。

48

纲领为代价而为策略争取到的决定性的、自主的功能上体现出来的“独创性”远远多于它的群众“策略”或蛊惑人心的纲领上的创造力……法西斯主义是为了上位而不是为了原则才发动的战争……这说明了组织,尤其是武装组织在法西斯主义中发挥的作用。<sup>①</sup>

接下来他继续列举了一些在法西斯主义的构成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它们的根源。在法西斯主义中,策略对于纲领来说具有优先性,这毋庸置疑是一个事实;这是一种缺乏实际纲领的运动的直接结果。法西斯主义唯一真正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而它唯一能为这种权力做的就是不断地保卫它,这也是事实。我也曾经指出过,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武装组织就是唯一合适的组织形式。但是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的根源都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并且它们全都确证了这一点。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想要解释其根源的唯一方法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目的创造了这次运动。然而,从这种判断可以继续得出,当权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直接权力;事实上,当塔斯科说当权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已经向其妥协的新阶级的统治时,甚至他本人就已经否定了这种结论。<sup>②</sup>

塔斯科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本质的否认导致了对法西斯主义政权力量的错误估计,就像共产国际的官方立场一样。

---

<sup>①</sup> Angelo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p. 344-345.

<sup>②</sup> 参见 Angelo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p. 350-351。



# 危机与出路



## 七、“民主的危机”

51

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并把大量失去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引入自己的作战组织。通过这种形式它几乎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得到了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时期以及1929年前的危机中,它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开始浮现。但是只有在意大利和德国它确实变成一种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它是作为一种解决意大利战后危机和德国大萧条危机的“政治方案”才夺取政权的。为什么它恰恰能在这些国家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或无法找到任何其他解决危机的出路?

资产阶级理论家常常试图从“群众的民主危机”(crisis of mass democracy)中推演出法西斯主义统治兴起的根源。在1929年出版的一本分析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中<sup>①</sup>,赫尔曼·赫勒(Hermann Heller)试图对法西斯主义问题做出一种理论概括。在一种描述性的社会学分析中,不管是他的结论还是理论前提都可以这样总结,即普遍接受的体现了所

---

<sup>①</sup>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有民主特征的价值秩序正在走向分解：

没有政治价值的共同体就既不会存在政治意愿共同体，也不会存在法律共同体。欧洲政治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隐藏在这种价值共同体的分解之中。<sup>①</sup>

赫尔曼·赫勒认为价值共同体的分解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中已经得到体现。这种理性主义,伴随着它的“科学”法则,这种可以用科学工具发现的,并且声称能够决定可预测的社会进步路径的法则,“带着其宪政国家的理念”,建立在代表公正的一种实质的理想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已经隐含了对所有价值的潜在的否定。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述就是:“整个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内涵的社会学问题,而人类和动物世界创造了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幻觉,它实际上只服从于没有任何理由和意义的法则。”<sup>②</sup>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幻灭的面纱;在某一点上它必然转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公开宣称每个政治目标都是掌权者的目的的一种表达,并宣称对社会进程的“合理性”或“可理性化”(rationalisability)的信仰就是那些掌权者的动力系统。按照赫尔曼·赫勒的理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发展中的这个转折点是从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社会学开始的:

帕累托的意识形态学说……代表了社会法则的理性观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并否定自身,政治上可能导向最彻底的幻灭的那个转折点。如果不被理解为施加暴力的技术手段,不仅每一种乌托邦,

<sup>①</sup>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17.

<sup>②</sup>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16.

还有每一项政治纲领、每一个理想和每一个目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帕累托所谓的数理社会学也不过就是幻灭的资产阶级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已。<sup>①</sup>

同时，用社团和工团主义的理念反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群众民主的反动也转向了自己的反面，就像每一个缺少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的价值共同体一样：

社团理念，由于内在必然性，必须转向完全相反的一面，转向最没有组织的却必然集权的独裁，没有任何有机的连续性，以至于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和社会有效的价值秩序。<sup>②</sup>

根据赫尔曼·赫勒的观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自我毁灭（帕累托）和缺乏任何稳定或具体价值内涵的有组织的行动主义（activism）[乔治·索雷尔（G. Sorel）]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普通的、趋同的根源。他相当合理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例子中绝对明显]，即“除了正式的暴力思想，事实上不止一种理念可以把1920年或1915年的法西斯主义同1922年或1929年的连在一起”<sup>③</sup>。任何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分解必然导向民主的危机：

在现实中，我只把自己限定在精神上——“措辞上”（spiritual-phraseological）确认我的政治意愿；只有当我估计具体的意愿共同体和总体的价值在政治上要优于（即使这种优先性在伦理和宗教的意义上被判明是相对的）我自己更明智的判断在现实中

53

①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20.

②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23.

③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40.

的实现时，我才让自己的信念服从于大多数的意愿。<sup>①</sup>

赫尔曼·赫勒思考的方式很多都是对的。然而他的分析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价值共同体”的存在或幻灭[人文的 (Geisteswissenschaften) 精神]理解为一种自发过程 (spontaneous process)，并且把法西斯主义问题解释成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动态过程在政治组织层面上的投射，“政治意愿形成”的层面的投射。按照他的理解，从资产阶级社会诞生时起，利己主义的物质利益占据传统价值共同体上风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而这是逐渐被资产阶级承认和接受的一个事实。他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以及“公民” (citizen) 的理想主义 (idealism) 必然互为补充，也没有意识到，由此能够确实迫使资产阶级暂时否定自我创造的价值并公然把其自私的物质利益总体当作自己社会的驱动力的只有那些存在于社会更深层面的、隐藏在意识形态 - 政治领域背后的过程。除非对更深的经济过程和相应的社会体制进行分析，否则无法从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或政治制度的民主的危机中推演出法西斯主义。

这一点需要得到强调，因为犯这种错误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共产主义者所持的立场也隐含了相似的错误。当共产国际在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差异描述为其“反民主的本质”时，这意味着（因为仍然没有具体的阶级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体现在一个事实之中，即它是一种反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已经”迫使资产阶级断然否定它宣扬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民主理想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1935年之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者并没

---

<sup>①</sup>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10.

有在民主的和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做过任何区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1935年之后形势发生了改变,但是法西斯主义统治形式背后具体的阶级运动仍然没有得到分析。在这些情况下,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有理由发出疑问:

这两种政权(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在“阶级内容”上有什么差异?如果我们仅仅是就**统治阶级**这个词来提问,那么就完全不存在差异。但是如果我们从无产阶级的视角来考量所有阶级之间的情况和关系,那么差别似乎是非常重要的。<sup>①</sup>

如果像1935年的共产国际那样,一个人在区分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时却没有研究所有阶级之间的情况和关系,那么归根结底,就像那些从民主的危机理念出发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一样,这个人的观点就是以先验的价值中存在差异这一前提为基础。

当然,认为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与民主的危机之间没有联系是荒谬的。民主的统治形式在意大利和德国都陷入了危机。但是这不能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夺取政权的。更确切地说,问题是,为什么民主陷入了危机。

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强调的是,笼统地谈及资产阶级民主危机是没有意义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典型的趋势是从民主导向独裁的,正如赫尔曼·赫勒和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有一段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也这样认为(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将促使资产阶级逐渐摘去它民主的面具并且用一种公然恐怖主义的方式行使权力)。法西斯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恐怖主义的政治统

<sup>①</sup> Leon Trotsky, *What Next?*, In Trotsky, *Germany 1931—1932*, London, 1970, p. 69.

治形式,或者不论是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还是在今天,在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都是一种**发挥作用的**政治体制,指出这些显得有点多余。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伪民主”,即它不仅建立在物质的不平等基础上,还建立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上(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它只允许一个严格限定的阶层参与决策)。而且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何时何地摆脱过这些不平等。

相应地,不仅资产阶级理论家(通过“政治价值共同体”的分解来解释发展着的民主危机)和似乎与其对立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包括那些试图直接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中推论政治法西斯化(fascisation)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都不能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做出解释。

所有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把本质上静态的资本主义理论形式当作出发点。他们把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功能上的**障碍解释成其内在矛盾的**最终**加剧,制度的“普遍危机”;资产阶级可能通过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打击无产阶级,这个由于矛盾的加剧已然变得越来越不满并越发具有革命性的阶级要寻找一条暂时摆脱这些困境的出路。但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无力恢复制度“正常”运行的环境。不过,这种描述与事实相违——即使从表面上看也是如此。因为不管严重的制度危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先例即法西斯主义由于具有威胁性的革命形势而直接夺取了政权。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已经发现,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确实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和大萧条的出路,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把资产阶级社会推向绝境。但是,持这些观点的理论家往往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唯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政治形式。他们的理论似乎与

之前提到的没有太大差别。这两种理论间真正的共同点（即它们共同的错误）就是，它们再也无法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找到一条**民主的**出路。它们只不过用不同方式阐释了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解决方案发挥的作用。共产国际的理论观点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存在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存在是危机的一种**象征**；后一种理论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解决危机的方案，暂时不能延迟资本主义瓦解但却能为其进一步发展确保合适的框架的一种政治制度。

在第二种思想系列中的确存有更多真实性。毫无疑问，有一种民主政治体制包含很多新的因素，被证明能与资本主义体制中发生的新变化相互兼容，这一点稍后将做出证明；同样变得清楚的是变革**过程**本身并不必然地须要伴随着暂时的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类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永久性危机，而且在德国，事实上在纳粹统治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后，为新资本主义体制恢复运行创造条件的正是纳粹统治时期。顺带说明的是，正如我们稍后会粗略地看到的那样，没有法西斯主义统治这一中间环节变革也会发生，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法西斯主义德国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民主形式变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实行新政的美国。<sup>56</sup>

持第二种观点之一的就是柯尔施，他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础的旧资本主义制度使自己及其庞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陷入了长期的危机。似乎没有比无产阶级革命更好的解决方案。然而，世界大战之后二十年的历史新事件表明，另一种不同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了，它已经不再能容纳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民主、和平行为。这种转变受到一种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不过它客观

上是进步的并具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和平民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自己有限的目的，它甚至使用了之前革命发展起来的不受限制的方法。很明显，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到达它最后的历史极限，统治阶级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其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上也都没有达到极限。民主改革之后紧跟着另一个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变革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其政治形式上是革命性的，而在其客观的社会内容上是演进的。<sup>①</sup>

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演进阶段，也就是在此期间它自身以直接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整合为基础，在柯尔施看来，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它的终极。今天我们知道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可能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那就是，在1940年，当他正在写作时，新政的成功似乎仍然受到质疑（美国完全失业的数字仍然突破了八百万，或者达到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法西斯主义德国截止到1937年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这个错误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他把任何形式的统一的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切观点都当作是毫无意义的。对他来说，反法西斯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完全一致，反法西斯主义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当然，从1940年的美国人们很难判断纳粹主义的最终结果，从柯尔施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事实上他并没有看到这些。他那个时候写道：“就工人而言，他们只是把一种农奴制形式换成了另一种。”<sup>②</sup>然而，如果他在这方面错了，那么他关于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任务是

---

<sup>①</sup> 参见 Karl Korsch, *The Fascist Counter-Revolution*, In *Living Marxism*, vol. 5, no. 2, 1940, p. 33.

<sup>②</sup> Karl Korsch, *The Fascist Counter-Revolution*, In *Living Marxism*, vol. 5, no. 2, 1940, p. 34.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实现根本改变的观点并没有错,尽管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改变也可以在其他统治形式下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

到目前为止我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我们的研究只有密切联系那些在 20 世纪的(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中普遍发生的基本变化,法西斯主义才能获得理解。但是,只依靠这些变化或者从这些变化中想要推论出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能把法西斯主义“说明白”的。因为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想要上升的话,社会经济进程就必须找到它们特殊的政治体制。

## 八、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

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其经济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革。事实上,这种变革是以“古典的”(classical)、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深层危机为先导进而引发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以自由市场的“自动调节”为基础。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甚至几十年,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有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列宁(V. I. Lenin)、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发生的变化并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认为(根据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用不同的方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是其矛盾加剧的时期,而且资本主义紧接着就会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更进一步演进的历史阶段。

考茨基和列宁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处境进行阐释的,这个事实与我们的讨论没有什么关系。根据考茨基的观点,不断发展的垄断趋势会近乎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废除。另一方面,列宁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制造的永久性的

危机处境只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将引发社会主义变革。今天对我们来说,简单地说,基本观点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垄断的发展趋势并且发现这将意味着,和以前的“古典的”发展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会更加紧密地彼此纠缠,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国家居然能够一点点地在实际中调控了经济。最初是无意识地,但是后来越发自觉,资产阶级国家寻找并找到了避免或解除经济危机的方法(在那之前都是以自然灾害的形式出现的),而不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基本特征。在那个时期很难对此做出预测。当然,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人员和物质极其可怕的牺牲,它是制度的基本功能紊乱发出的第一个严重信号)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引入了大量应急措施,这些措施的使用已经不能再把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说成是一个自动的调节者。但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把这些干预手段仅仅当作临时举措,这些举措可以用特殊情况来解释或辩护,并且在战争结束时就会被废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再次“正常地”运行。而事实上这的确是战争结束后确实发生的。然而,经济的自动运行(当然,它曾经“自动”的唯一时候只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被证明不可能恢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的国际角色逐步地但却极其快速地衰弱(例如,美国这时候暂停移民)。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明显影响了德国经济的运行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获胜国不仅要求战败国赔款,还要直接干预它们的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现阶段也很难看出,资本国际关系中的这些变化和世纪之交经济结构上的变革会让战时的应急措施永久实行。就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相信一种“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视生产的“自然法则”,这是不可思议的。<sup>①</sup>然而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希望,世界大战和战后危机只是根本上运行良好的制度中微不足道的机能障碍并且并不必然会复发时,马克思主义者则确信事态将**必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按照革命者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复发的危机将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按照改良主义者的观点,通过某种方式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经济从其机能障碍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和平地发展成社会主义。

60 当然,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从一个方面确实证实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它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偶发事件。然而,危机并没有那样最终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而只是证明了自由模式的不可行性。危机后的几十年中,一场世界性的改变发生了,新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兴起,其基本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制度的运行;为了消除威胁性的或已经存在的危机,它不是临时而为,而是要长久地指导经济。这种分析的局限妨碍我详细地指出自由制度走向破产的原因,我只能概略地补充这一进程的经济背景。[我在此要感谢费伦茨·亚诺希(Ferenc Jánossy)。]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粗放型发展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初叶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已经完成(换句话说,整个经济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性质)。首先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已经不再依赖于从非资本主义经济区域向资本主义地区引进劳动力,其次,持续的生产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

<sup>①</sup> 参见 Gunnar Myrdal, *Beyond the Welfare*, In *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Welfare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London, 1960。

劳动的工人和雇员中找到新的市场。(长久的武器生产是另一种“解决方案”——但只是暂时性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因此依靠工资和薪水生活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必须不断地制造并提出对于国家资本生产的商品的有效需求,这一点变成了资本主义赖以继续的(因此也是资本家阶级切身利益的)基本前提之一。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功能是要创造政治手段来保障这些阶级的特殊需要能够一直得到满足,甚至为了新的有效需求的持续生产而竭力人为地唤起需要。

保障商品消费的有效需求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指导经济功能的一个元素。国家以直接的方式在经济中发挥着<sup>61</sup>不可比拟的更大的作用,部分是通过向创造可观的国民收入比例的大型企业融资,部分是通过其金融和信贷政策影响私人企业。

稍后我们会看到两个旨在于本国内消除世界危机的伟大尝试——一个是罗斯福新政(是如何在一个受控的民主体制内实现国家指导经济的经典例子),另一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以之前提到的两种方式为基础的。但是,正是由于各自政治体制根本不同的性质,两种元素的天平也是各有侧重。这种差异不单纯是实行经济转型的两国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在许多方面还是各自政治观点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差异。尽管德国的纳粹政权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行重组经济的任务,一项世界各地都提上日程的任务,然而,它带着自身特点的解决方案却产生了使制度处于永久性的政治张力的“纯粹的”经济后果,已经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与法西斯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使联合变得没有可能。

## 九、作为唯一选择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在考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功能。虽然在统治形式和政治手段上两种政权之间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挥着不同于纳粹主义的历史功能。能把法西斯主义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现象的正是也只有是国家社会主义生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并且成功地夺取政权。如果法西斯主义只是在意大利上台掌权,那么今天它可能早已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回头来看,很明显,纳粹主义的胜利使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变得越发重要。追溯它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墨索里尼发起的运动是20世纪第一个打着革命的幌子获得成功的右翼群众运动,希特勒及其党羽从墨索里尼那里获益匪浅。其次,分析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弄清楚特殊的**政治条件**,这样的政治条件通过满足经济需要使法西斯主义转变成一种新资本主义体制。

意大利同德国的经济环境当然是不同的。德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而当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时意大利只是一个极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战后的政治历史中相同或至少相似的特

征与它们在经济上的差异一样多。很容易就能够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由于不同原因)都是无组织、软弱、缺乏执政能力的。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在经济意义上同样虚弱,而且由于它自身无法保证政治统治,因此它也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还远远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粗放型发展。事实上,它才刚刚起步而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正是要保障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证明完全无力做到的粗放型发展(也就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就我所知,葛兰西是第一个阐释意大利局势特殊性的<sup>63</sup>历史根源的人。我在许多方面都参考其精彩研究的弗兰兹·博克瑙(Franz Borkenau)<sup>①</sup>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与葛兰西具一致性的分析,尽管它可能完全独立于后者。

国家统一战争之后,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议会制度。但是庞大的封建集团对于意大利经济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保守的地主阶级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建立在封建地主与资本家联盟的基础上,而这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资产阶级不想在经济上任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摆布,那么它就必须创造新的政治条件。

资产阶级还很虚弱时它曾帮助发展了工人运动,因此它可以转而依靠运动来协助其迫使地主阶级交出政治权力。当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寻求“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的支持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取政权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真正全新的和独特的是它依靠工人有组织的阶级运动甚至鼓励其发展壮大。根据葛兰西的观点,“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会和

<sup>①</sup> Franz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Faschismu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1933, pp. 513-547.

劳工组织的兴起与发展能得到与意大利相同程度的援助”<sup>①</sup>。但是这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都产生了特殊的后果。从1900年起(当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解除后),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的政策偏向无产阶级并形成了意大利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依靠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及其群众影响,看起来它似乎成了现代操控的资本主义的雏形。但是对于这种权力结构来说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在意大利是完全缺失的:即经济的完全资本化、充足的商品以及能够购买它们的足够富裕的工人。国家只有一部分(都灵地区)变得工业化,只有小部分农业生产[在艾米利亚(Emilia)和波河流域(Po Valley)]能够经得起竞争。结果就是对工人需求的满足,那些由人为强化的工会运动所表达但是因为运动的真正实力不得不得到满足的那些需求,不仅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中特定的私有资本家的利益相冲突,还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总体相冲突。政治上整合的、改良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之所以克制着不去扰乱妥协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强大,那样做将会再次把他们抛向受制于封建地主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满足工会的需求阻碍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使其不能推动国家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并且不能为小资产阶级在工业中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完全陷入破产。

因此,从经济角度看,意大利改良主义起到了明显反动的作用: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恰恰是为什么妥协最后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也变得不能成立,因为只有生产持续发展,它才能够在相对持久的意义上被整合。(决定意大利社会主

<sup>①</sup> Gramsci, *Ein Jah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102.

义阵营大多数左派意见的正是这一点,尽管工会组织本身和连接这一官僚组织的党翼及其议会派别要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者的大多数意见。)1919年到1920年间,当工人阶级试图夺取经济权力时,这一点就得到了清楚的证明:那时,这是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独一无二的一次。但是正是由于焦利蒂主义<sup>①</sup>的政策是要在自由议会民主制的限制内保证工人阶级最大可能的政治影响,工人运动相对左翼的领导者没有能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意大利左翼社会主义者比任何人都明白在生产这一点上经济权力与民主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具有多么根本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个,像葛兰西,清楚地看到“完全废除议会民主对意大利革命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sup>②</sup>。正因如此,1920年的革命尝试失败了(而且是没打一枪一弹就失败了),尽管包括最重要的几个在内的500个大型企业都在工人委员会的控制下,而且艾米利亚的农村无产阶级组织正在向地主施压并  
65  
提出条件。社会党在向夺取政权迈进中并不仅仅走出了一步,更确切地说,它想要用议会的方式获得政权。最后出现的局面是工人阶级似乎仍然不愿意掌权,而即便如此完全无助的资产阶级仍然陷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由于在战斗中工人获得了某些经济效益,广大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认为工人要为其不幸的遭遇负责,墨索里尼的行动部队(Squadri d'azione,意大利语)为他们提供了解决方案。他们转向攻击无产阶级组织并且开始打消其士气,用暴力摧毁他们;他们从依然掌握着经济

---

① 乔瓦尼·焦利蒂是意大利政治家,曾多次担任意大利首相。他当政时代被称为“焦利蒂时代”,他在任职内主张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并吸收了改良主义的某些主张。——译者注

② Gramsci, *Ein Jahr*, I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 1967, p. 105.

权力的艾米利亚的市镇开始,这也绝非巧合。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天赐良机(对于资产阶级和北方的自由地主来说都是如此),其实他们直到那时还是完全没有头绪。他们支持墨索里尼消灭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打算帮助法西斯主义分子夺取政权。但是从墨索里尼的冲锋队(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下)变得比工人组织更强大的那一刻起,软弱无力的自由资产阶级再一次进退维谷:他们要么再一次与南方封建地主结盟,要么与墨索里尼结盟。第一种选择意味着与封建地主分享政治权力,但是其后会阻碍其经济力量的增长并遏止势在必行的资本积累。它将使建立一个现代的意大利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与墨索里尼结盟将意味着资产阶级上层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但是此时它可以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自己的经济力量,并且还会打开一条资本积累之路。面对这两种选择,资产阶级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因此,国家特殊的结构在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基本上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资本化的、不发达的农业国,尽管如此却有着发达的工人运动。

66 不言而喻,1918年到1920年的革命性危机也为意大利提供了成为社会主义的意大利这样一种完全进步的选择。但是即使以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在世纪之初的二十年里已经达到的水平来看(这些改良主义的成就实际上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一个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同样不可能满足无产阶级的特殊需要。当然,不像法西斯主义政府,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能够“公平地”分布资本积累的责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所以——只要我们也不把它当成一种解决方案,就算国家陷入社会混乱并由此退回到之前的发展水平上,西班牙的水平上——再

也没有有什么其他的方案能像发展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完全地适合于最新的需求了；这正是法西斯主义所做的”<sup>①</sup>。无产阶级运动的不成熟和无准备在客观上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因此从意大利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仍然是唯一进步的解决方案。尽管存在随之而来的所有那些恐怖(这些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的)，但是仍然不得不这样说。

众所周知，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期间，意大利致力于快速的资本化进程。国家开始电气化，开发研制电机，设立人造丝绸产业，创建了现代银行体系，农业蓬勃发展，通过排干沼泽扩建农耕区域，建成了重要的公路网，等等。如果不是法西斯主义时期启动的社会进程，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快速发展以及现如今已经走上集约型资本主义发展之路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当柯尔施把法西斯主义描述成无产阶级革命未爆发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进步性选择时，很明显他指的就是意大利的发展进程。但是完全不能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得出同样适用于解释德国法西斯主义作用的结论，尽管两国的**政治**处境存在许多类似之处：即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政治上**虚弱的资产阶级、战后明确的革命形势与随之而来的革命的失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进步作用在于经济的资本化。德国法西斯主义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因为在两次大战之间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资本主义大国。<sup>67</sup>

---

<sup>①</sup>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Faschismu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1933, p. 525.

## 十、作为选择之一的法西斯主义(德国)

许多人把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作用等同起来,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两者都是在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政治环境下夺取政权的,两者都依赖于具有反资本主义特征的右翼群众运动,并且两者都不是在威胁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时期而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后产生的,也就是当危机不可能再用革命的方式解决的时刻产生的。除此之外,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表明了两个国家本质上相似的特征。丝毫没有威胁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把政治要塞交付给一个在那之前都只是扮演着政权的政敌角色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政治权力不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它在政权中取代的政客要大得多。广度上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政党在意大利利用了一到两年,在德国仅用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成为国家唯一全能的政治组织,拥有不受任何类型的法律界限限制的行政权力(executive power)。深度上是因为,政权把所有那些之前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或至少看起来如此的生活领域全部政治化。而且它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取缔了所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这是这两种政权共

同的首要特征(我这里所强调的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它们不仅取缔那些旨在革命性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即不仅是共产主义政党),还要取缔在那之前都是制度构成性部分的大量改良主义组织;不仅是那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意大利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包括经济组织,即工会。

后提到的这一特征对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挥历史作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国,但是这当然不是因为纳粹政权要助推资本积累过程。我打算在下一章详细分析纳粹政治统治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这里我只是简要回答一下后面的问题:是什么迫使资产阶级放弃直接的政治统治而支持法西斯主义?<sup>69</sup>

发达的德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用担心土地贵族,他们已经变得资本化了(虽然是普鲁士风格的)。俾斯麦(Bismarck)和威廉(Wilhelm)时期德国的阶级妥协为快速的资本化创造了条件,这与复兴运动到翁贝托被暗杀期间的意大利阶级妥协截然相反。因此,如果一种建立在地主-资本家妥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以君主制度的形式被重建的话,那么它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来说至少不是一无是处的。

德国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在1918年革命期间结成的联合对它来说也应该是可接受的。1924年到1929年间的经济繁荣表明,依赖于整合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并满足其要求的政治制度所需的条件在德国已经成熟了。在此期间,大量社会改革被引入德国,而在美国这些都是在新政下展开的。(这些措施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当然是种沉重的负担,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因此,法西斯主义远不是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能性。当然,毋庸置疑,在法西斯主义德国经济体制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正如在战后它所呈现的那样,这些变化非常有助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这些结构变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才能实行(事实绝非如此),总的来说这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在德国也是危在旦夕的。

就德国的经济局势而言,在民主和法西斯之间存在一种选择。就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夺取政权之前,托洛茨基言辞非常激烈地提出资产阶级统治可能要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在1932年1月,他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称法西斯主义与民主是相同的决议: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完全不是“绝对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说,它也不是意味着两个不同阶级的对立。它是同一个阶级统治下的不同的制度。这两种制度,议会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不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阶级的组合,并且不可避免地彼此尖锐地冲突。

社会民主主义,今天资产阶级议会制首要的代表,依靠的是工人,而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没有群众的工人组织就不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不摧毁工人组织就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的实施范围就是议会;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根基就是破坏议会制度。就垄断资产阶级而言,议会制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它要根据历史形势选择一个或另一个。但是就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言,选择这种或那种手段则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意义;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个关乎政治生死的问题……民主的资产阶级本性与法西

斯主义的一样多……但是统治阶级不可能真空隔绝。它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他阶级相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权中,资产阶级主要依靠着一个事实,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者驯服。我们在英国能够发现这一制度最发达的形式,在那里它由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共同代表。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中,至少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资本依靠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小资产阶级。<sup>①</sup>

那么,很清楚,托洛茨基在1932年已经意识到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借此维持自身统治的两种给定的选择。他没有提出资产阶级倾向于这种或那种统治形式的历史形势问题。<sup>71</sup>但是他研究了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的德国局势,那个时候两种情况都已经相当清楚,即资产阶级任由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自由发展,此外它并不想坚决抵抗法西斯主义(它是否会这样做在那个时候倒也无足轻重)。因此,托洛茨基不可能从历史的视角阐述这一问题,但现在我们能够这样做,或者说1930年之前,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对解决方案做出任何决策。在1932年的德国,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只有一种方式能描述当时的局面:资产阶级正在使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夺取政权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这关乎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因而必须阻止它。由此,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唯一公开的问题就是:是否有可能创建联合工人阵线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并以陷入内战的威胁迫使资产阶级修改决定?换句话说:是否有可能使众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确信法西斯主义正威胁着他们自己狭义的阶级利益,同时还要使共产主义者确信,在这样一种

<sup>①</sup> Leon Trotsky, *What Next?*, In *Trotsky, Germany 1931—1932*, London, 1970, pp. 64-65 and 69.

时刻,任何一种承诺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阻止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做出了它自己的决定:从实用政治的立场出发。因此,询问资产阶级最初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或者如果它有,是什么迫使它从中选择了法西斯主义方案,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仍然在其中还拥有方案选择权的只有无产阶级。

甚至早在1930年,托洛茨基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上升的原因问题,并且试图从这里得出德国为了政策的利益也会效法的结论。他的结论是“错失的或没有充分利用的革命形势”已经导向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随后在德国的兴起),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先锋证明他们无力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改变所有阶级的命运(包括小资产阶级)”<sup>①</sup>这种革命形势的结果。托洛茨基由此反对共产国际所持的观点,即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壮大的重要影响以及资产阶级惧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影响。很明显,不管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在革命开端已经明显错失的时机下才发展起来的。

许多学者也由此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巩固和胜利与其说受到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到了改良主义实力的影响。例如,奥托·鲍尔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它是在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优势被迫转向防守,革命高潮正在退去的时候成功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为了防御威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自保并没有把国家权力交给法西斯主义冲锋队,但是却具有压低工资、消除工人阶级的

---

<sup>①</sup> Trotsky, *The Turn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German Situation*, New York, 1930.

收益、破坏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目的：换句话说，不是要镇压革命的社会主义，而是要破坏改良社会主义的成就。<sup>①</sup>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对此观点提出了一个更为极端的说法(他只分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而他的一般性结论在很多方面就意大利而言是合理的，但是它们并不适用于纳粹主义)：

多数派(maximalists)夸夸其谈地鼓吹革命只威胁到了路灯的灯泡和偶尔几个警察特务的骨头。但是改良主义及其合作团体，其甚至在危机时期也能增加工人收入的能力以及对失业者的支援，威胁到了一些更加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资本家的利润……资本主义借助法律保卫自己反对多数派[他们无时无刻不把时间花费在歌唱《红旗》(*Bandiera Rossa*)和《国际歌》上]，如果旧法不够，它就创造新的；但是要反对用和平、民主和合法的方式打破阶级之间平衡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就变得残忍并开始使用法西斯主义的一套手段……只要改良主义力量薄弱，它就并不危险，除非当它获得实力时，也即，当它达到那个界限时，超过了那个界限，民主和法制将被用来反对资本家的利润。<sup>②</sup>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托洛茨基和西洛内这两极<sup>73</sup>之间存在决然对立。但是以上引证的所有三位作者都具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这体现在他们的观点中，即资产阶级没有支持法西斯主义，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强盛的时期没有帮助

<sup>①</sup> Bauer, *Der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154.

<sup>②</sup> Ignazio Silone, *Der Faschismus*, Zürich, 1934, pp. 70-71.

它兴起或夺取政权。的确，在革命上升阶段，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存在，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未利用的（并且，从某个给定的时刻，无法利用的）革命形势产生的这种观点与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于改良主义运动的强大而兴起的这种观点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后一种观点完全不可接受。首先，能够坚持自身需求的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存在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英国如何？）。其次，向新资本主义体制的转变恰恰需要有力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的存在（美国新政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工会的强大）。

但是“未利用的革命形势”也是一种不充分的答案。尽管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在战后危机的革命时期兴起的，但是在1929年危机之前，也就是完全失去革命形势的时候，它并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或实际的权力因素。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法西斯主义总是伴随着某些社会危机而发展，此外它也往往利用某种群众的不满。但是不可能得出任何一般性的“公式”可以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从数据中“推算”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每一个法西斯主义变成群众运动并夺取政权的具体情况只能由个别国家的社会处境的总体和包含经济、社会及政治迹象的全部复合体来进行解释。

事实上，那些已经步入集约型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确面临着托洛茨基所提到的选择。因此，考虑到德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德国也具体存在这种选择。人们无法通过分析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来说明为什么德国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这一方案——或者至少，这种解释是不够的。

74 答案首先必须在德国的政治局势中来寻找。如果仍然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框架内并且依靠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德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然是有可能的。欠缺的正是这种发

展“唯一的”政治前提。

因此,比起从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从其他前景的立场来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就不会仅仅是无效的说教。在意大利,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就等于在经济萧条甚至下滑与经济发展之间做出一种选择一样;因此除非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发生,否则任何民主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卫都是反动的。但是在德国,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它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使其转变成新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并且如果这样一种选择存在,那么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体现在实现这种可能性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可能性。不可能同意那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必须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统治是什么形式的是不相关的。(在此我们要回忆一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共产国际在1934—1935年之前始终持有这种观点,甚至直到那时它也仅仅是出于策略考虑才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一些马克思主义左翼反对党的代表也提出过这种观点,像柯尔施。)

之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有可能而且必须区分两种选择方案,有两个基本的原因。首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这个词的狭义上)要求它选择民主。诚然,新资本主义体制的民主变体依靠的是正被整合到制度之中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并且当下,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总体发展的一个明显的障碍。但是改良主义组织无论如何还是**独立的工人组织**,它们是**阶级组织**(不同于法西斯主义集团),而且从有利的情况看它们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奠定基础。尤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不相关的,这是因为,新资本主义体制的民主变体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有可能提供最高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由此为之敞开最宽

限度的受教育机会；对于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来说真正构成社会基础的一直以来都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工人团体。

在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要考虑的第二点因素必然要超越无产阶级直接的阶级利益问题。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直接的目标是要创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后者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个消除异化的社会的手段，这个社会消除了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之间的裂缝并由此赋予每个个体以机会用最大的可能掌控那些已经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标准。在这个方面，新资本主义体制的民主变体并没有向前迈进。但至少它维持了那些价值的有效性——现实中大多数个体所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理想，反之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建立在对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理想价值的否定之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其意识形态往往被包括部分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所接受，无疑代表着在通往类价值实现道路上的一种倒退。

同样无可辩驳的是，理论上，新资本主义制度比法西斯主义更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德国资产阶级事先就已经明白这一点），并且它把自己带来的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导向反“犹太人”和“非生产性”的资本中；但同时，它也创造了特别的政治条件并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取代了资产阶级正常的日常生活，而资产阶级认为这至少是“不舒服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并不欢迎永远的革命方式的主张，即使它们是为了服务于反革命的目的。它想要的是联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参考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形象的描述并在必要修改后（*mutatis mutandis*）来比照希特勒的篡权：

76 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

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褻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sup>①</sup>

托洛茨基声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一种手段无异于另一种,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是在夺取政权之前,一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生活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希特勒只要被任命为总理,他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客。但这远不是一个定数。即便如此,那为什么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要选择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呢?

实际上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能这样提出问题。对于那些把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视为无关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对于那些仍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把它视为一种危机现象还是发展的适当形式),这个问题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卢卡奇的“勃鲁姆提纲”(Blum theses)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他们毅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勃鲁姆提纲”遵从共产国际的立场把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都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是他们坚持认为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译者注

“美国方式”，也即民主形式，是这种发展的合适的形式，并且他们试图发现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形式在欧洲的实现，尽管改良主义的工党官僚也试图引入美国式民主：

77

工党官僚采取这一立场具有重要的经济原因。战后的帝国主义是不会以任何形式被迫容忍战前的工会斗争形式，主要是因为它必须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此外还因为竞争已经受到了影响。它迫使工会屈从于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屈从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实现的。一种方式是墨索里尼的：在以小资产阶级和中农为基础的反革命的帮助下，他摧毁了旧工会，取而代之以全新的工会（卢卡奇也把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即真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视为消灭工会和摧毁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瓦伊达）。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对于资产阶级和工党官僚来说都是充满危险的。这要求资产阶级付出巨大努力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转变成与部分资产阶级上层的联合；工党官僚中的一部分在工人运动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意大利流亡者），而那些融入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人与工人群众陷入了敌对的关系。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和工党官僚来说一样，应用那种通过强制仲裁（*staatliche Schlichtungswesen*）而已被引入德国的方法更简单，也更安全，而且这种方法通过《工会法》（*Trade Union Act*）也已经部分地在英国开始生效并注定被冠以“蒙德主义”（*Mondism*）。很清楚，就无产阶级而言，两种制度的阶级成分是相同的。只是方法不同。当然方法上的差异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国家中不同阶层行使权力，或

者毋宁说他们按照不同的比例共享权力。<sup>①</sup>

如果我们暂且搁置这个事实,即卢卡奇还给国家干预调和资产阶级与工会利益的那些制度也贴上了法西斯主义标签,那么很明显他把工会斗争中的国家干预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且完全有理由搁置卢卡奇命名的方法,因为“提纲”与一种基本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即只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提上日程,社会主义者就有责任保卫所有那些能够避免引入墨索里尼模式的形式。)

国家干预的方式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国家承担起<sup>78</sup>在雇主与工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作用(这显然意味着个体资本家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国家”的利益,即总资本的利益)。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工会被消灭或者“国有化”,并且整个工人运动被肃清;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一种对资产阶级自身来说也充满危险的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卢卡奇在1928年就已经提出了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备选方案的可能性。事实是他没有认识到意大利局势的特殊性,而且他对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描述尤其不适用于意大利。但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正如他夸大了美国、英国的经济状况与欧洲的不同一样,这很有可能是由一个事实引起的,即在对意大利范例的全身心的研究中,他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经济落后。

“勃鲁姆提纲”还提出了为什么这个或另一个备案会被选择的问题,并且明确说明了,理论上,没有选择法西斯主义符合社会基本阶级双方的利益。很值得援引卢卡奇关于这一点的全部论述:

---

<sup>①</sup> Lukács, In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Neuwied, 1967, pp. 310-311.

垄断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紧密相连在战前就已经出现,而战争过程中和战后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它。此外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迫使国家确立制度防范来进行对抗。群众的解体,他们对国家事务没有任何影响力,工人的阶级斗争被法律手段废止,这些事实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它们现在在新的情境下出现。原因如下:(1)今天群众的政治分量和层次比起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很大提高;但是与之对抗。(2)受到垄断资本支配的群众宣传手段(出版社等)也极大地发展了。(3)而且这些趋向于垄断资本同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趋势得到了工人阶级官方领导部门的支持,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此,同样,美利坚合众国是典范。但是在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着与美国的根本差异。首先,在美国(正如在战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由于积累、资本出口以及超额利润广泛而急剧快速的的增长,工人阶级上层在物质层面上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在欧洲,这种发展的基础却是非常狭小的。其次,在美国缺乏欧洲工人富有战斗性的传统。最后,在许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仅仅在战后成为政治统治阶级(正如德国),或者只是在那时他们才在政治领导权中获得较之以往更大的份额(正如匈牙利)。因此,政治民主一边与实际上缺乏影响力的群众相和解,另一边与制度上或强制性的对阶级斗争的镇压相调和,仍然没有达到美国的理想而且将来也无法达到。这并没有阻止资产阶级和工党官僚试图跟从美国模式。但是这一事业的基础势必比美国更不稳固,因此没有欧洲的资产阶级会完全不

考虑“经典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类型的可能性。它将一直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备案,一旦阶级斗争尖锐化,一旦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就随时准备使用它。<sup>①</sup>

卢卡奇对现代操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所需的许多基本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表述:工人阶级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分量,垄断资本的政治宣传与日俱增的有效性,改良主义群众劳动组织的领导者被吸收到权力结构中。他还试图列举那些可能诱使资产阶级不顾法西斯主义具有不利于它的一些方面的事实,依然用法西斯主义的强权来保存自己的统治的因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卢卡奇的理解,以下因素导致了资产阶级保留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1)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资产阶级(英国除外)还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2)工人阶级富有战斗性的传统出现在除了英国以外的每一个主要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3)资产阶级完全缺乏政治领导的经验,完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

80

事实上,卢卡奇自己也说过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时期,资产阶级被迫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工具来用。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社会危机的形势并不必然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尖锐。更进一步,他过高地估计了经济落后在导致一个国家转向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他把意大利模式当成了范例)。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他表述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德国法西斯主义而言,对问题的适当的表述应该如下进行:即使资本主义集约型发展阶段在德国已经结束,到底是什么迫使资产阶级通过帮助法西斯主义当权来尝试和寻找脱离1929—1933年危机的道路?“勃

<sup>①</sup> Lukács, In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 Neuwied, 1967, pp. 312-313.

鲁姆提纲”提供的对形势的分析包含着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重要内容。

## 十一、为什么德国的资产阶级<sup>81</sup> 选择希特勒？

首先必须强调，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单一的因素来解决。我们不能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征没起任何作用。然而，毫无疑问，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粗放阶段（extensive phase）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区别都不足以解释这些国家相应的政治解决方案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经济因素排除在能够影响法西斯主义选择解决方案的那些复杂因素之外。

此外，我们需要以极高的历史精确性来明确表达我们的问题。简单地假设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现有危机而选择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方式是十分武断的。我们需要把这一问题更加具体化。首先，德国的资产阶级上层领导集团是否能够——确切地说是否已经——发现摆脱现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且不会妨碍他们基本利益的其他方式？第二，纳粹独裁是由一个掌握着基本经济力量的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决定”而产生的吗？（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

忘记,尽管德国的大部分地产已经被资本化了,但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两个阶级。)最后,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得政权是资产阶级决定的结果(当然不是某一个集体的决定,而是大量各种具体决定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符合统治阶级最初的意图吗?

我试图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回答这些问题。更准确地说,82 根据我所能获得的历史数据和分析,我希望在一种假设(将在下一章被详细证明)的基础上提示一个大致的答案,这种假设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功能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即它为资本主义从粗放型增长阶段到集约型发展阶段的转变创造了政治条件。

从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开始,德国资产阶级就面临一种两难困境——更准确地说,现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就是在此时开始在资产阶级各界中受到明确的质疑。(资产阶级的右倾转变是要保持政权的简短历史的特征。)这种明确的质疑表现为两个基本形式。首先,存在一种对“铁腕”(firm hand)的普遍要求,需要一种政治制度,行政权力的权威在这种制度中不会频繁地受到质疑。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能够贯彻其决定的牢固政治权力意味着国家有能力干预经济运行,至少意味着国家有能力为其“正常的”、在本质上不会发生危机的运行创造条件。资产阶级的这种要求并不是德国特有的。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在整个世界都造成了类似的倾向;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当选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德国形势所特有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认为,如果不把魏玛共和国推翻,他们自己就不能建立可以指导和控制经济的稳定政治权力,即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第二,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眼中,魏玛共和国对德

国的状况来说似乎是不合理的、不适合的，因为它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过大的空间——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反对和攻击这种制度本身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意味着被整合到制度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在政治层面他们已经被迫成为反对派）。资产阶级为什么在这样一种严峻危机的情况下不赞成共产主义组织的合法存在就不需要详细解释了，况且，共产主义组织看起来比事实上更具有革命潜能。它反感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这样明显）的原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只有在回想起来的<sup>83</sup>时候，这种反感似乎才是令人迷惑或不合理的。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种能毫不含糊地整合改良主义运动的制度可以运行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英国了。并且因为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改良主义相比，英国改良主义具有不同的过去和现在，它几乎不可能成为德国的先行范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建立的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资产阶级“规划”的，当然也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规划的，它对自己“驯服”无产阶级的能力是最不自信的。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完全有理由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导致魏玛民主完全不可行的始作俑者。社会民主主义自始至终致力于保卫一种根本无法运行的制度。

“雇主协会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 of employer's associations）在1932年1月的会议证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反魏玛情绪的根源与这两个因素有关，该会议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团化等级制”这一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以“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被肃清”作为其主要报告的标题。德国资产阶级的官方组织认为以专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是摆脱危机的唯一方法。

德国资产阶级有意识地努力用另一种权力取代魏玛共

和国,即用某种专制政权取代魏玛共和国。事实上这是其经济利益的要求。其实,20世纪危机中的民主总体上说并没有变得不可行,正如作为新资本主义改革和其后稳定的新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形式,民主总体上没有变得无法发挥作用一样,然而魏玛民主确实完全不适合这一角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魏玛宪法是资产民主的模范宪法。它完美地符合自由理念。它试图保证每一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能够拥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或政党,由此,国家的政策根据<sup>84</sup>这些利益之间不断的冲突所达到的平衡得以制定。这种自由民主形式从来都不可能以其纯粹的形式在任何地方存在。在德国这样一个根本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它是在这种形式已经过时的情况下才被建立起来的。这里不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的时候。但是即便我们只考虑英国或美国的形式,它们的政治机制也显然在根本上与魏玛不同。除了它们主要的政治党派不是代表特定和限定的社会阶层利益这一事实之外(比如,我们很难断言英国工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这些形式的框架内同样不会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利益冲突。在选举之前各种利益可能会剧烈碰撞:但是在选举之后,获得权力的集团就能够实行其政治路线。在魏玛共和国则不是这样。无论总理是谁,他的活动都会不断受到国会的阻碍,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只可能通过“总统内阁”(即没有获得国会信任的政府)进行统治。就政治而言,这意味着长期的危机状态。

同时,在政治体制中还是存在导致魏玛民主破产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它的联邦特性。德意志帝国政府恰恰在各州(In the länder)经济事务中最无力贯彻其意志。

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以国家领导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数年内，在资本主义框架中，除了把权力转让给纳粹之外，没有其他推翻魏玛民主的方法了。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在德国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帮助下指导经济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者极大地打击了陈腐的、从来都不可行的魏玛框架。即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只能在纳粹的帮助下才能推翻魏玛政权。1928年，这种形势还不是很清晰，但仍然存在稳定的希望。<sup>85</sup>但是到了1930年，这种形势就非常明确了。

从1930年开始，德国有了总统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一开始依赖中央，后来主要依赖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右翼联盟。但是这不能形成稳定局面，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靠一次起义和恢复与两个统治阶级联合的君主政体是不可能推翻魏玛政权的。另外，布吕宁(Brüning)保守“中央政府”的经济措施没能克服危机或为国家干预制度的实行铺平道路。恰恰相反，罗斯福任期上经济政策头几个月的成功结果和希特勒掌权后沙赫特政策的成功结果都说明，经济危机只能通过为经济提供公开国家补贴的通货膨胀手段来解决，而不是通过通货紧缩手段来解决。获得能够改变魏玛宪法的多数支持是不可能由民主(即宪法的)手段产生的：宪法只有通过占2/3的多数的支持才可能被修改，右翼——包括纳粹——即便是在1933年3月的选举之后也没有足够的席位。

因此，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可以在否定的意义上得到回答。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想要清理魏玛民主，而这种清理只能在纳粹的帮助下实施。同样不能否认，德国资产阶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多多少少有意识地、“自愿地”选择这种解决之道：因此，我们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无疑，在纳粹统治阶段中，随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德国资产阶级

的意图肯定不是真实的。因为一旦资产阶级允许希特勒掌权,它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我们已经研究过的这些内容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危机发生的这些年里,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这种横扫一切的力量一起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支持这种运动来解决它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成为这样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86 不能只是简单地说德国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其自身问题和使自己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才帮助法西斯主义获得权力就可以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了。毫无疑问,德国资产阶级的确帮助了希特勒,而且用了两种方式。首先,一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集团(尽管绝不是所有主要的资产阶级权力团体)为这一运动提供资金支持。第二,他们从来没有激烈地反对纳粹的暴力机构;同时,他们坚决反对共产党人“违反宪法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通常都是不太重要、不太激烈的。但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而它们并不能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资产阶级强大到能够利用弱小的运动(在1928年,纳粹党仍然只有80万选民)并将其转变为国内最大的政党,那么它为什么不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一种符合自身“格调”和目标的统治形式呢?最终追随纳粹党的民众(在掌权之前达到1300万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他们实际上将选票投给了中央和非纳粹右翼;德国人口中有一大部分人不是大资本家,他们并不接受纳粹的解决方案。

我在此前的论述中试图说明,纳粹的意识形态明确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愿望,这些阶层也对纳粹的组织形式感兴趣。大量的纳粹选民来自于中产阶级是一个历史事实。把选票投给纳粹党的选民,一些来自城镇,但主要还是乡村小资产阶级(农民、白领雇员和行政人员)。如果能够证明1929年

的危机首先影响的是中产阶级而且他们在德国承受的负担比在其他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都要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纳粹主义发展的完整解释了。但不幸的是，这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和意大利相类似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此而言确实是事实。德国工人阶级强大的改良主义群众组织同样参与到了政治权力中，因此有能力保证工人阶级拥有相对良好的生活条件（主要是仍被雇用的，特别是他们中被组织起来的老工人），甚至在危机时期<sup>87</sup>也是如此。他们能够为失业者争取一些救济。资产阶级被迫把福利措施的负担放在中产阶级身上。因此，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在危机时期确实威胁到了中产阶级。（我们同样不该忘记一个事实，美国在恢复时期只有到后来才引入这些手段。）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也解释了德国在危机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法国或美国那样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有组织的工人们维持着现状，这无疑会为他们带来一些优势。同时，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和失业的工人转向左翼。这一点部分是由于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这部分人的社会出身，部分是由于德国共产主义者政策的不稳固性（rootlessness）：现在的（明显无望的）革命行动、现在对右翼口号的采纳、现在对“民主”的坚持——没有任何有关摆脱困难的方法的具体指示。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危机的确对中产阶级造成的打击比对无产阶级要大，对他们的伤害也比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但是这不能解释一切。还有导致中产阶级激进化的其他因素。

农民的处境是完全令人绝望的。当然，世界性的危机不会只折磨德国农民，美国农民和法国农民的处境同样困难。

但是,德国农民感觉他们还受到大庄园(large estates)的威胁。他们在传统上就是右翼人士,而且一直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人关注他们的问题,这是个事实。尽管纳粹党人对民主土地改革只字未提,然而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处境中的农民阶级,却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然壮大中发挥了根本作用,特别是在其得票数快速增加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政党关注过人口中这一不小的部分。所以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sup>88</sup> 纳粹纲领和纳粹党派内部的派别斗争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是如何有意识地努力在农民中为他的党派赢得支持。他和施特拉塞尔兄弟的决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这个党派真实名称一致,他们试图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失业流浪者之外扩大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从工人阶级中进行招募。希特勒知道,尽管他的国家主义纲领可能从共产主义者那里争取到少量有怨恨的和落后的工人(这确实发生了,到1933年他从左翼那里争取到大约100万选民),但是他不可能真正掌握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且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与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决裂之后,他马上与“鲜血与祖国”纲领的作者沃尔特·达雷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清楚地表明,他期望获得农民的支持以对抗工人的意图是多么坚决。根据历史学家的一致观点,达雷的土地纲领是纳粹纲领中论述最充分的部分(在大多数时候,是执行得最少的部分)。

该纲领的执行是以同样侵略性的扩张主义为基础的,这种扩张主义体现了全部纳粹意识形态的特征。如果农民阶级的基本问题以保证大庄园的完整这样一种方式获得解决,那么就不可能进一步分割农民的小农场[这是土地继承法

(Erbhofgesetz)所阻止的]，而且被驱逐出其父辈土地的农民子孙必须获得有关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承诺，即属于斯拉夫人的优质土地。纳粹党卫军主要由年轻的农民构成，这并非巧合。

德国资产阶级只能通过解决乡村小资产阶级即农民阶级的问题而保留其政治力量(即只能不依赖纳粹党人找到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但是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意图：或者是通过激进的、民主的土地状况改革(德国资产阶级对旧统治阶级的态度是卑屈和虚弱的，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是通过领土扩张。德国资产阶级对于后一个任务也无法胜任。它对其地位没有足够的自信，不可能认真考虑对《凡尔赛和约》做出任何修改，更不要说本来就没有任何希望地试着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直接推向新的战争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解释中产阶级激进化的原因：<sup>89</sup>战争的失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公正的和平协议的后果。这对德国中产阶级的地位产生了直接影响：军官的“失业”、摧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本家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可以理解，这种危机在德国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等等。但是其直接影响甚至更加重要。在五年的繁荣之后，中产阶级从1929年开始再一次对他们的处境感到绝望，他们开始愤怒和怨恨地反对魏玛民主；为战争失利[“暗箭”(Dolchstoß)或刀刺在背理论]和使西方势力把《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德国成为可能而负担主要责任的力量就是魏玛背后的力量。

这些情况使人口中的大部分转向反对魏玛共和国。即便是在1919—1920年的革命阶段也是如此：1919年时右翼选民的数量仅仅450万人，但是到了1920年，这一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人。但是他们转向纳粹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恰恰在其中起了作用。与统治阶级截然相反,这部分人口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上的敌意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主义心理而反对魏玛共和国。一旦他们发现一个既承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保证德意志民族“崛起”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政党,他们马上就加入了这一党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因素给了纳粹党人可乘之机。希特勒被证明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知道如何利用可能使他获得权力的所有时机,他聪明地把革命方法和议会策略结合起来,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和与资本家协商的意愿结合起来,等等。

在危机的第四年,只有一种力量能够一劳永逸地废除这种现存的、不可行的制度,这就是纳粹党人。对资产阶级来说,除了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们之外,已经没有其他摆脱危机的方法了。因此,资产阶级促成了一个把比战前政权还严酷的条件强加给普通市民的制度的出现。在交付权力的时候,它无法预见到这种制度的真正本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的希望可以证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超越了战争所引发的普遍冲突,纳粹制度建立了一个具备现代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所有因素的德国。



# 法西斯主义制度的 政权和统治



## 十二、法西斯主义 和波拿巴主义

法西斯运动在两个欧洲国家实现了它的目标。政党获得了权力,独裁政权得以建立。在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因素促使(或迫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交给法西斯主义者。根据它们不同的起源,这两种制度履行了不同的经济功能。但是它们的体制——不仅包括它们的政治体制,还包括它们的社会体制——可以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哪个或哪些阶级(阶层)真的从法西斯主义政权那里得到了好处?当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说“不喜欢谈论‘资本主义’的人也会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sup>①</sup>时,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绝没有限制资产阶级在工厂里的经济权力。它没有妨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甚至还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满足。法西斯政权在这两个国家倒台后,它毕竟曾经存在这一事实产生了一个新政权,其能够保证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统治。法西斯主义政权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新政权的性质。但是这与我的主张并不冲

---

<sup>①</sup> 引自 Bauer, *Der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5。

突,我认为,资产阶级本身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中并不行使政治权力,在政治统治者的决定中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法西斯主义受金融资本支配这一陈述对我们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没有什么帮助。法西斯主义主要服务于并满足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只有在此种意义上,这才是正确的,而且如果对它不加解释的话,那么它很难令人信服。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特性的描述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也能得出这种特性的描述。比如,赫尔曼·赫勒写道:“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新形式的国家,它只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独裁政权形式。”<sup>①</sup>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显然不能把自己简单地限制在对法西斯主义权力“精英”的社会学描述上,也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关于哪个阶层在法西斯主义中行使权力及如何行使权力的争论上。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很明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形式之一。这就是我认为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的界定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

在其观念的—典型的纯粹形式中,法西斯主义是由激进的少数派统治的,这个少数派在本质上是由军事化的、下等社会阶层的小资本家、流氓无产者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组成的,它利用有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主义化的恐惧以及保守派对议会制的厌恶来诱导他们接受由这个少数派来掌权。它的目标是摧毁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并实现新“精英”不受限制的统治,这种新精英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保护和扩大其权力,通过某个种族或其

<sup>①</sup>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1929, p. 123.

他种族的历史神话证明这种统治是正当的。<sup>①</sup>

在费切爾的描述中没有太多可以反对的。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因为他没有提出法西斯主义和经济结构之间真正关系的问题(尽管他从未真正否认法西斯主义保证财产关系完好无损),所以他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如共产国际的界定(只是简单地重申法西斯主义维护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权力不受损害)也同样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认为对法西斯独裁政权进行分析的最合适的方法要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为依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进行了一次分类式的尝试。他循序渐进地遵循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体制的分析,以证明法西斯主义在每个方面都与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的见解一致。他写道: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性是公开的资本独裁。其表现形式具有以下特征:行政权力变得独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被摧毁,所有其他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屈从行政权力。但是,它的社会或阶级内容通常由资产阶级和私人业主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受资本剥削的其他阶层的统治来决定。<sup>②</sup>

95

托洛茨基反驳了塔尔海默和德国共产主义反对派,他说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权力前的阶段[布吕宁和巴本

<sup>①</sup> Iring Fetscher, *Zur Kritik des sowjetmarxistischen Faschismusbegriffs*, In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 Munich, 1967, p. 237.

<sup>②</sup> August Thalheimer, *Über den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28.

(Papen)政府]才是波拿巴主义的。塔尔海默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似乎在很多方面仅仅是学术行为;我们不能用类推法来代替对历史现象的实际分析,即便类推法对阐明某些问题有所帮助。可以证明,布吕宁和巴本政府时期以及法西斯政权本身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波拿巴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实际上表明它们中的一个能够比其他的都更好地“满足”马克思的定义的话,它就构成一种理论的进步了吗?试图确定法西斯主义是否是一种波拿巴主义政权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性质进行争论看起来确实是一种无意义的吹毛求疵。但是,我不同意那些认为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的人的观点,举例来说,安杰洛·塔斯科(Angelo Tasca)在他这么做时曾说过:“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战后现象,用历史上‘先辈们’的类似事件对其进行定义,即通过对波拿巴主义进行类推而对其进行定义,仍然是没有结果的,并且有可能是误导性的。”<sup>①</sup>确实,法西斯主义在许多方面不能与过去的任何历史现象相提并论。也许不仅仅是道德感让我们很反感把希特勒的恐怖和路易·波拿巴的统治相提并论,更不用说拿破仑(Napoleon I)了。但是,即便能够证明这两种历史现象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仍然认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或其形成的统治形式所进行的类比,肯定是有价值的。虽然其本身从来都不能提供理解具体历史现象的钥匙,但是通过提出这种类比的行为,他们正在完成一个理论任务:他们在重新演绎马克思最卓越的分析之一,即把政治统治、政治结构和经济关系作为一个复合体进行分析的最杰

---

<sup>①</sup>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 338.

出的例子。

马克思的分析提醒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对一个政权的实际状态和特点的理论检验必须建立在分析该政权涉及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那些实际掌控政治统治权和那些行使经济权力的阶级和阶层。他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政治社会学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地通过对财产关系的检验就可以完成的,财产关系本身并不决定制度的政治体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证明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出发点(完全与它是否证明了法西斯主义符合波拿巴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无关),因为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被社会民主政治和斯大林主义接受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否认的东西。事实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主要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有可能存在的(在法西斯主义之前的历史中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即拥有决定性生产资料的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不是波拿巴主义,我们肯定不会被迫在两个错误的选项中进行理论上站不住脚的选择:要么,通过观察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没有受到损害的,甚至被增强了的垄断资本的权力,断言法西斯主义制度是直接建立在垄断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要么,通过检验掌权阶层的社会起源及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否认垄断资本日益增强的经济力量。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是,作为主要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拥有与此前所有社会的统治阶级相区别的重要的自身特点:它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坚持进行政治统治。在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的纽带已经相分离。在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世界中,他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并不能决定他在政治国家理想领域中的角色。

在所有此前的、“自然给定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还没有分离的社会中，掌握经济权力的人总是直接地（作为他们经济地位的结果）和自动地充当社会的政治领导者。在

97 资产阶级社会中就不再是这样了。只要且只有拥有资本，资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并且如果他确实拥有资本，那么他就能或多或少不受限制地满足他的特殊需求，而不必成为统治社会并决定理想共同体政治活动的阶层中的一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家很少愿意放弃自己的私人活动而进行政治活动，更不愿意使他的私人（即资产阶级的）存在服从于他的公共的、政治的（即市民的）存在：“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sup>①</sup>如有可能，他会投身自己的生意，而不牵涉到政治当中。在资产阶级个体那里如此，本质上在他所在的阶级那里也是一样的。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并不像一个阶级。只有在本阶级受到威胁时，阶级利益才走上前台（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个体必须使其自我利益服从于这种利益）。这是由这个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产生的，首先是因“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而产生的，在细节上做必要的修改（*mutatis mutandis*）后，同样适用于这个社会的其他阶级。

只要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妨碍资产阶级自由地主张其自我中心的物质利益，那么资产阶级当然会被迫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资产阶级成功地消灭封建统治阶级（比如在法国），或者尽管保留其政治上的统治却迫使它不能妨碍资产阶级主张自己的物质利益（比如在英国）之前，资产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8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译者注

阶级只能勉强承认政治斗争和现存政治形式的必要性。但是一旦资产阶级能够不受限制地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政治活动对它来说马上就变成一种负担并且简直阻碍了它努力实现一直为之奋斗的机会。因此,资产阶级在有些时候做好了舍弃政治的准备,将其交给愿意行使它的阶级或阶层。

这个例子的第一个及最纯粹的历史形式出现在法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所遇到的抵抗,法国资产阶级用最纯粹和最经典的斗争形式反抗封建阶级。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拥有真正经济权力的阶级,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孤立的。英国<sup>98</sup>资产阶级已经做出了让步,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后来的行动才表明,作为让步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逃脱了。只有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坚持斗争直至获得政治胜利且“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sup>①</sup>。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纯粹形式的统治不仅是累赘的,而且经常是危险的。如果资产阶级把它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普遍利益表现出来(并坚信它们应该如此),那么它只能与封建主义做斗争。但是一旦它开始自己纯粹形式的统治,其理想中的意识形态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译者注

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sup>①</sup>

资产阶级是否放弃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果放弃,那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放弃——这一问题总是取决于相关国家具体的、历史给定的阶级关系。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但在这种方式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社会权力**而**单单放弃其政治权力**: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sup>②</sup>

9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1866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6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译者注

正的宗教”<sup>①</sup>，在这时，他已经在一般化的意义上使用波拿巴主义概念了。他对词汇的选择恰恰表现出资产阶级很少有能独自进行统治。根据历史条件，资产阶级经常与其他阶级或阶层（比如旧的封建统治阶层）分享实施政治统治的权力，或者把实施政治统治的全部权力交给他们，只要资产阶级能够在此前确信后者不会限制其经济力量的增长。（在很多情况下，资产阶级甚至都不尝试获取政权，比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此外，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也许资产阶级甚至会接受政治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政治的政府）手中的情况。我已经表明什么样的条件会使资产阶级默许这种情况：必须存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因此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力也不直接由资产阶级行使，而是由一个在这些“正常”情况下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机构行使。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转让给真正独立的机构——即转让给一个在社会上独立的、只能通过获取行政权力而保证生活来源的阶级，是比较少见的。如果有一个被“市民社会”驱逐出来的，但是由于其出身或以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在一个更低的层面被重新整合进来的阶层，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路易·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它的存在使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国的一个政治因素，尽管他根本没有在法国“市民社会”中象征或代表什么东西：

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

---

<sup>①</sup> 1866年4月13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Marx -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55, p. 17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译者注

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sup>①</sup>

- 100 正如与资产阶级存在相分离一样,与普通资产阶级和明显依赖于资产阶级本身的“普通”资产阶级政治家相比,这种组织及其领导者有着巨大的优势。与那些因其在资产阶级生活中的作用而必须维持其“信誉”的人相比,他们更占优势。“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sup>②</sup>

恰恰因为这一阶级实现某种社会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获得行政权力,所以它将维持这种权力视为关乎生计的问题、它自身存在的问题;就因为这个原因,它也必须获得保证,以防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它。为了维持其统治,社会的“首脑”波拿巴,必须给予他自己的阶层巨大的优势:“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sup>③</sup>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阶层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资产阶级的损害: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p. 371-3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3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译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4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译者注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sup>①</sup>

101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波拿巴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行使行政权力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p. 423-4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575页。——译者注

的独立性,行使权力的阶层在“市民社会”中没有其他功能,而且如有必要这个阶层可以以任何其他阶级的名义来反对社会的某一阶级。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分析有可能被曲解为以下这种结论:在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被逐渐从社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分析了官僚从君主专制时期到议会共和时期的逐渐发展,他的结论是:

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我标注的加重——瓦伊达)成了完全独立的東西。<sup>①</sup>

因此这仅仅是表象,因为波拿巴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确定的阶级:“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sup>②</sup>然而,这个阶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描述为一个阶级,因为作为其成员,“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sup>③</sup>。但是另一方面,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4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4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译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4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译者注

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sup>①</sup>。所以行政权力能够使其自身独立仅仅是由于它被一个不能代表自己的准阶级所掌握。

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立场并 102  
开始逐渐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趋势视为指向行政权力独立性的发展的理论<sup>②</sup>,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没有任何根据。这确实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并没有这种趋势。它仅仅出现在以下这些阶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些阶段中,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行使政治统治对资产阶级来说变得不方便甚至危险;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在“市民社会”中没有任何作用且只能通过行政权力的实施获得一个角色的阶层。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即使是在那时,这种权力也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个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还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允许拥有其自由运动并且其日常生活的自由运行受到这种带有“独立”倾向的行政权力的限制。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这些限制,是因为不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就只能依赖无产阶级与这种乌合之众做斗争了:

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 4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译者注

<sup>②</sup> 例如参见 Theo Pirker, *Vorbemerkung*, In *Im 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Faschismus*, Stuttgart, 1965, p. 21。

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sup>①</sup>

然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真正意义不是它指出了行政权力变得独立的某种可疑的倾向,而是在于,它承认有这样一些情况存在,即资产阶级自愿将行政权力的直接实施交给其他阶层,有时甚至交给那些只维护资产阶级自我中心和物质利益的阶层,并在同时大幅度消减公民权。当然,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它会尽最大努力避免这种与行政权力相分离的情况。

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表明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非常适合作为分析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的起点。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塔尔海默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即便布吕宁和巴本政府确实通过利用在当时似乎不可动摇的阶级平衡而得以为继,但是认为这些政府借助总统法令进行统治,行政权力依赖于希特勒主义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行政权力依赖的是传统统治阶层和高压政治的宪法机构。但是,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认为分析这一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因而没有必要在细节上评价塔尔海默的“波拿巴主义”模式的法西斯主义。格里彭堡(R. Griepenburg)和恰登(K. H. Tjaden)<sup>②</sup>认为塔尔海默理论的基本缺点是它的僵化,他们是正确的。塔尔海默用预先确定的常量进行他的研究,作为结果,他使用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现象(他寻找的是相同点和不同点),而不是借助马克思的分析把它当作探索法西斯主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36, vol. 2, pp. 385-3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538页。——译者注

② R. Griepenburg, K. H. Tjaden, *Faschismus und Bonapartismus*, In *Das Argument*, no. 6, 1966.

义历史特殊性方面的起点。这使他的分析多少有些非历史的性质：

在这种政治社会进化的模型中，阶级构成、社会经济的对抗和经济再生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离在本质上都假设被假设为常量，资产阶级社会永恒的现在；而变量存在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安排中。后者决定“阶级关系总体”中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的特定结构和特定功能中不连续的变化。<sup>①</sup>

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与社会总体的基本因素无关。结果是我们得到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作为波拿巴主义现代变体的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危险具体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哪个阶段这一问题还没有答案。如果经济再生产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是资产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特点，那么法西斯主义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而不仅仅是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塔尔海默在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提出了他的理论，这就解释了他强调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不是其历史起源和可能性的原因。）塔尔海默局限性的观点也没有让他提出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法西斯主义的领导者们不仅必须满足他们自己私人军队的要求（比波拿巴的私人军队要庞大得多），还必须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但是，塔尔海默对法西斯主义以波拿巴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若干方面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西斯主义夺取政  
104  
权意味着资产阶级与直接的政治统治相分离并将其交给一个已被驱逐出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再生产的阶层。正如我曾

<sup>①</sup> R. Gripenburg, K. H. Tjaden, Faschismus und Bonapartismus, In *Das Argument*, no. 6, 1966, p. 461.

提到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主要由感到生存受威胁的中产阶级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精英”是从没有任何稳定生存方式的阶层中招募的。<sup>①</sup>此外,通过法西斯主义,行政权力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可以完全决定它自己的政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使人们有理由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否认这两个特征确实体现法西斯统治特性的人根本不值得与其进行争辩。否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过废止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及忽略所有法律限制来进行他们的统治就是在完全忽视历史事实。

问题甚至不是广泛的资产阶级集团是否能够影响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或者他们利益的代表是否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真正的问题是,有权威的资产阶级集团中的**领导人物**是否能够指挥法西斯政权的政策制定,或至少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这些政策。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那么确定的,尽管我们稍后会发现,认为垄断资本直接命令法西斯元首制定政策的想法同样是对事件实际状况的一种简单化,甚至是一种歪曲,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是掌握着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的傀儡。但是即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主要的资产阶级集团不能具体地决定法西斯政权的政策,我们仍然无法否认,法西斯政权的政策最后还是**服务于主要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如果需要,甚至会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

<sup>①</sup> 参见 Daniel Lerner, *The Nazi Elite*, Stanford, 1951。

## 十三、意大利的独裁政权

105

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和公民权利无疑符合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不会要求他们再做什么牺牲了。如果墨索里尼没有把他的命运和希特勒的命运完全绑在一起，那么他的政治目标就不会以任何方式危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工人运动的肃清消除了资本积累道路上的障碍。工业发展开始了。作为结果，经济能够为此前被驱逐出生产的那些阶层提供就业岗位，群众不满的来源由此大大减少。经济起飞甚至使工人生活水平在有可能的范围内缓慢提高。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的内部紧张是墨索里尼不能满足法西斯主义运动本身的要求或不能维持“长久的反革命”而导致的结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它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在德国就存在这种长期的任务：犹太人问题得以“解决”和侵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在获得权力之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权力本身。但是一旦获得权力，很明显的是这种运动缺少任何进一步的政治目标而且行政权力的行使只能保证这种运动中一小部分人的生计。墨索里尼版本的“十二月十日会”过于宽泛，以至于其

成员中的大多数不能成为权力实施的直接参与者。一旦墨索里尼巩固了他的权力,他马上就会竭尽可能地减少这种运动。但是这样做他就创造了一种局面,即资产阶级能够在它觉得符合其利益的任何时候解散法西斯主义集团。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诱使墨索里尼将自己陷入阿比西尼亚冒险(Abyssinian adventure)的原因,而这被证明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战争本身是“国家行为”,并因此暂时满足了法西斯运动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这引起了意大利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冲突,并几乎使其陷入完全的孤立。意大利只有通过改善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并完全重新定位外交政策才能摆脱这种孤立。但是这样做,墨索里尼就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和独立性:不是因为他人人为地保持了外部的紧张状态来保证运动的团结(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领导者也是这样做的),而是因为制造这种人为的紧张状态在意大利对于经济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粗放阶段,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必为战争工业让路。)事实上这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因为与希特勒的联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丢掉了它的“国家”特性,而这使广泛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国民的抵抗(national resistance)。这就是与德国人截然相反,意大利人民大规模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在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覆盖的范围比与希特勒结盟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的原因。最后,在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时,意大利的统治阶级成功地遣散了法西斯主义的领导阶层。

正是因此,我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命运、政权的“兴衰”,具有“非经典的”(non-classical)性质。如果我们在第三章中对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描述是正确的,即如果它通

过把作为特殊整体的“国家”与作为个别的所有其他国家相对立从而（在表面上）消除了国家内部特殊利益的矛盾冲突，那么法西斯主义就不能始终遵循其“经典路线”，而必须坚持维护其特殊的国家利益。相同的执着态度必须同时用于创造使运动保持长期存在的紧张状态；如果国家没有真的受到其他外部力量的威胁，这就意味着持续的、侵略性扩张主义的政策。然而，如果这种侵略性就像意大利那样明显地不是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服务，而是为了另外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服务，那么这种政策的失败就会产生与其希望正相反的效果：远非保持运动的存在，而是将其完全毁灭。在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面临两个选择。或者它可以宣布放弃所有侵略性的诉求，由此必然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广泛群众支持的、主要依靠正规军事组织的、直接依赖于掌握经济权力的阶级的普通独裁政权（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及其领导集团的命运将直接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或者它可以使其侵略性政策服从于外国利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107

显然，我们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非经典的”类型不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独特的经济因素（不再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其产生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事实，而且是根据适用于它的整个历史的考察（尽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因素决定）。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人也许会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材料的一种十分武断的处理。这就意味着用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抽象的、“理想类型”的标准来描述和评价具体的历史上的政权，并将它们分为“经典的”和“非经典的”范畴。不必探究什么冗长的方法论方面的争论，我只想提一下马克思，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在他谈到经济发展时，他只提到了英国；在他谈到政治发展

时,他只提到了法国。这些便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经典类型。

然而,我想要简略说明一下为什么这种过程不是武断的。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两种独裁政权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以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它们都是在这种运动的支持下夺取了权力。如果它们坚持在不失去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保留其权力,它们就必须用某种方式满足这种运动的要求和愿望。如果这种政权不再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或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实际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就必然会失去其最初的特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不是经典的。但这不是因为不符合我们武断的预设条件,而是因为它不能满足特定社会制度存在的内部条件。另一方面,德国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经典的,因为它能够使制度的基本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并因此为其内在“可能性”的发展留出空间。

## 十四、德国的独裁政权

那些研究纳粹政权或运动与德国资产阶级上层之间关系的人通常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即对纳粹党领导者在掌握政权之前与垄断资本代表之间的接触进行分析。那些想要说明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人寻找后者为纳粹党派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开或秘密渠道。那些想要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的人则煞费苦心地说明只有一个很小的资产阶级集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支持希特勒,而大多数则至少保持中立。他们就这一主题写出了数以百卷的文章。虽然这种经验证据和反证的展示有助于确定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具体责任,但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处理理论问题的适当方法。我们也许能够证明德国全体资产阶级上层在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权力之前、夺取权力的整个过程中和掌握政权之后都毫无保留地对其进行支持: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服务于这个阶级的利益。我们仅仅可以证明,这个阶级对法西斯主义运动及权力的出现、取得支配地位和得以维持负有责任。当然,就整个阶级而不是特殊个人而言,这并不需要任何具体的证据。即便该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亲自支持过希特勒,它仍然对法西

斯主义负有责任,因为在经济意义上它一直是资本主义德国的领导阶级。

我们只能通过分析德国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来回答法西斯主义是否符合德国垄断资本利益这一问题。如果它促进了经济发展,如果它帮助国家摆脱了粗放型经济增长之后的整个社会危机,那么答案肯定是它  
110 毫无疑问地服务于德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保护了财产关系的基础完好无损。即便是在它的最初形式中,纳粹运动的某种模糊的反资本主义也没有指向财产关系的真正变革。如果我们低估了施特拉塞尔派别(失去了在党内最初的巨大影响力),那么反对国际“犹太”资本的激进时期就将一直与支持“生产性”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倡议,决不会接受对现有财产关系进行激进变革的想法;尽管对这些关系的限制不过有所暗示。而实际上在这一方面什么都没有做过。对某些资本主义的利益进行“限制”,即便有所实施,也只是意味着国家对资本主义竞争的管理,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德国垄断资本领导集团的明确目标。

在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下,正如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操控性经济下一样,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以两种方式出现。它可以凭借行政权力与资本家联盟(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集团的代表性组织)之间的协议而出现。或者,它可以以如下方式出现,即行政权力采取措施并主要决定国家经济政策来反对资本家及其组织。

在纳粹政权的前三年,也就是危机逐渐被克服的这段时间,是以其中的第一种为特征的。但是从1936年开始,国家干预的第二种形式占据了支配地位。它违背了德国工业传统分支中领导集团的意志,即纳粹国家不仅要继续执行其重

整军备的政策(在这之前这些政策一直获得资本家领导集团的赞同和协助),而且要依靠这样一种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成为必需的经济重组——关乎生死的问题——使德国得以发动一场明显具有掠夺性的战争(“掠夺”一词在这里必须按照其最严格的意义进行理解)。<sup>①</sup>

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没人能够否认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在设计一个确定的战争计划并打算相应地影响德国工业的发展。在掌握政权后的最初阶段,该政权间歇性地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这明显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即便是德国资产阶级中最没有侵略性的群体也对这些尚武的意图产生的最初的经济结果感到满意,因为在那时这首先只是意味着违背《凡尔赛和约》的德国国防军的发展(但这是在获得必要的正常防御力量的限度内的——这当然会获得德国经济领导者们的批准),其次,意味着军事工业发展到“正常”水平,这在实质上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在1933年,旨在消除失业的国家财政建设项目在促进工业提升方面确实比军事工业的生产增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些庞大的国家项目,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军事工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国防军的建立一样都是备战所必不可少的。

---

<sup>①</sup> 大部分研究德国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历史著作将这种变化的时间确定为1936年。不同的历史学家为其赋予怎样的重要性当然取决于他们的理论态度。我自己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Dieter Gross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 Das Argument*, no. 1, 1965(第二版,1967)和Tim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9。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简单描述,还是关于其经济历史以及法西斯主义下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问题的。它们本身对于详细阐述马克思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希特勒和纳粹领导阶层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一个是快速并极大地改善群众的社会处境(这只有通过  
112 保证充分就业才能实现),以维持并扩大其政权的群众支持。另一个是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纳粹政治家对经济如何实现这个目的以及期望这种情况出现是否合理根本不感兴趣。但是,纳粹政治家的这些要求明确地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

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是1933年至1936年期间全能的经济“元首”,他是德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我已经表明,我不同意帕尔·尤斯图斯对以下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即法西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口号为什么没使资产阶级上层感到恐惧。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理论中“侵占性”资本和“生产性”资本的对比表现了金融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斗争,还认为与金融资本的利益相比,法西斯主义在事实上确实符合工业资本的利益。但是除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严格对立没有事实根据以外,沙赫特的角色本身就证明了金融资本,至少在纳粹掌权之前,至少和工业资产阶级一样因帮助纳粹掌权而获得了利益。直到1936年,整个资产阶级上层都对这些结果感到满意,我们在稍后会发现,在1936年的转折点之后资产阶级的政治失色也并不是金融资产阶级特殊处境的结果。

在沙赫特战后所著的著作<sup>①</sup>中(这些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试图证明,他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必然导致战争经济,而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稳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套用一句他的原话。根据沙赫特的观点,希特勒在此时没有表现出任何为战争做准备的意图,

---

<sup>①</sup> Hjalmar Schacht, *Abrechnung mit Hitler*, Hamburg, 1948; Hjalmar Schacht 1933; *Wie eine Demokratie stirbt*, Düsseldorf, 1968.

而且也没有真正开始进行任何准备。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它也没有特别有趣。事实是,他的经济措施——国家有力地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不仅意味着迈出转向战争经济的最初一步,而且意味着符合资本主义集约发展阶段的指导型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手段。它不仅仅(或并不主要地) 113 是沙赫特用来证明这一点的理由。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沙赫特措施和罗斯福措施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克服危机的关键问题是消除失业,也就是重新启动生产,这就要求创造对所生产商品的有效需求。罗斯福在美国、沙赫特在德国都通过国家投资和为私营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大量贷款实现了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所以,为克服危机所做的改变首先出现在金融政策中。然而,这些改变不仅仅是暂时的。通过引入这些措施,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地改变了。

沙赫特对其金融政策的创新之处的描述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用于罗斯福新政:

在此之前,中央银行的任务是使自己适应经济过程。如果经济活跃,产生大量的营业额,并需要大量的货币,那么中央银行就发行货币。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回收货币。它在过去经常是伴随着经济的,但现在它已经成为经济的管理者。中央银行在过去为有待进入流通的可销售商品发行货币,而现在则为将来可销售的商品发行货币。<sup>①</sup>

在此之前,“不要发行超过已生产商品数量的货币”是国家金融政策不可触碰的禁忌。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这一

---

<sup>①</sup> Hjalmar Schacht, 1933: *Wie eine Demokratie stirbt*, Düsseldorf, 1968, pp. 99-100.

禁忌置之不理。但是,这种“通货膨胀”政策不仅要求国家的金融干预,它还需要非常严苛的措施以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运行。除非是已发放贷款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监督,除非国家积极地干预外贸和货币兑换等,否则没有限制地发行货币将导致通货膨胀。这是这些“实验”所特有的——罗斯福新政和纳粹经济政策都是如此。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德国(与美国截然相反,美国选举出来的总统拥有所有必要的<sup>114</sup> 权力),魏玛政权不能保证这种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

然而,即使是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资本主义领导集团在整体上对政策的制定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关键的政治位置都被与资产阶级上层没有密切关系的纳粹领导人占据了。沙赫特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占据关键位置,但在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发言权。然而资本家集团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1936年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完美地符合他们的利益。

用于解决农业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的《土地继承法》也在1936年之前发布了——事实上它早在1933年秋天就已经存在了。在这里,国家还是坚决地干预经济的自由发展。但是,这种措施表明,德国经济已经开始适应帝国主义扩张的要求。这是第一个清楚地表明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如何将政治需求优先于经济需求的措施。通过保护中小自耕农的财产及结束他们自身生存的不确定性,《土地继承法》将所有年轻的农民(长子除外)驱逐出农业领域。因为充分的就业得到了保证,所以这甚至为他们也提供了工作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问题无法真的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他们也不会大规模地接受这种解决方式(他们甚至没有得到承诺)。纳粹党卫军就是从这一阶层中招募的;它的成员被挑选出来成为即将被征服的斯拉夫土地的拥有者。这不仅在总体上为

征服战争创造了人力资源,而且为战争本身创造了一个目标,即消灭和奴役待征服地区的原住人口。因此,1933年土地问题的解决方式已经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时期完全不会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甚至连普鲁士贵族大地主的利益也受到了尊重:大庄园根本毫发未损)。

到1936年,纳粹党人刚刚掌握政权时似乎无法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德国已经能够步入正常经济发展的轨道之中。但是,这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应该加入正常的世界贸易。就德国来说,生产原料很匮乏,这意味着要出口工业产品来购买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应该能够满足长期增长的需要,从而为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提供不断扩大的市场。然而,与罗斯福新政相反,第三帝国的“新秩序”没有为满足这些先决条件留有空间。<sup>115</sup>

就经济政策的这些基本方面而言,德国和美国的实验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式。经济再启动的前提是商品的生产应该符合需求。最初,失业率的大幅度降低(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为”的手段得以实现)保证了两国需求的增长。因为德国失业率的降低比美国快得多(到1933年末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一),所以在没有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保持了三四年的快速增长。(相应的数据事实上非常矛盾。根据一些数据,实际工资在1933—1936年期间增长了;根据另外一些数据,实际工资已经开始降低,而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法西斯主义企业不是为了保证工人利益而存在的,它们也不会行使新资本主义工会的功能。)一旦德国实现充分就业,发展中的工业就只能通过果断地转向军工生产来确保市场。在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采用能够最大限度地

保证各个社会阶层生活的、国家支持的福利措施(比如退休金);另外,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政权对改良主义工会给予的政治支持(正是罗斯福使美国工会的权利真正有效)。结果就是,保证了对所生产的商品的长期需求。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废除了所有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所以没有什么能够迫使个人资本家提高雇员的工资。

116 因此,当1936年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德国经济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工业政策)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一个选择是把军备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根据这一时期的国防需要,军队已经按照“正常”水平进行装备了),将工业转向消费品的生产,为和平生产提供投资。工业将在出口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提高到足以扰乱贸易平衡的程度。

另一个选择是加速度地扩充军备。

代表德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其左翼、钢铁工业的沙赫特选择了第一种解决方式。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当然不会考虑到这种选择的所有后果。其中一个就是必须同样仿效罗斯福新政提供的社会供给:他们的成员必须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放弃大量的利润。即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选择和平的解决方式也依然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的大资本家确实为了他们的雇员而被迫放弃了大量个人利润,而新兴的纳粹经济却没有迫使德国资本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美国的方法是自由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可靠方式(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会促使他们选择这种方式),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只能而且必然是暂时的。

但是,另一方面,纳粹领导者自身只有一个选择:发展军事工业。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接受关于意识形态原因的理由——即希特勒

及其党羽的反苏维埃态度,希特勒在世界政治领域的个人抱负等等。这将会把事件的产生原因定位为某一运动或少数人的狂热;它没有考虑到希特勒本人及其领导集团中几乎所有成员在利益的要求下如此轻易地丢弃了他们的信念。而且,虽然纳粹领导者中确实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经济事务专家,但是把他们描述成没有能力理解经济专家们有说服力的论断以及这些论断的真实性的低能者仍然是可笑的。把纳粹党人视为普通的低能者就是忘记了他们在掌握政权之前和之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灭所有对手时已经充分证明了的他们是多么杰出的政治家这一事实。认为他们在1936年以后就陶醉于自己的成功并从此坚信自己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想法也是幼稚的。用纳粹集团的利益来解释希特勒在1936年之后的决定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也更容易理解。<sup>117</sup>

如果德国经济加入到和平的世界贸易中,如果政策提高了生活水平,那么这对1936年的纳粹政权意味着什么呢?十分明显,它意味着,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在经济目标立足于满足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物质需求的地方,当不再有任何失业、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来保留极权主义独裁政权呢?它将更适合资产阶级回归议会体制;如果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的根基被如此削弱,纳粹集团将没有力量来保卫自己。我确信,如果人口中最广泛阶层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德国国家主义以及对凡尔赛条约条款的羞耻感和抵触情绪(无疑是存在的)将不足以维持纳粹运动的存在。人为地保持紧张状态并创造一种没有退路的形势才符合纳粹党人的根本利益。对他们来说,政治权力的丧失将意味着他们的完全消失。到1936年,纳粹领导精英仍然没有融入经济统治阶级,也没有获得任何

经济权力。他们无法像普通资产阶级那样在不损害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情况下就能够退出政治。

军备和备战政策意味着,即使实现充分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只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而紧张状态的来源仍然存在——在群众的眼中,这种紧张状态(纳粹党人向其“证明”的)只能通过战争解决。纳粹政权的内在动力必然  
118 将其导向战争并加速军备生产,而且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即便是在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这种制度仍然能够实现这种内部紧张状态。

向军工生产转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军事工业生产的是不能销售的商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只能由国家购买的商品。作为结果,国家开始负债(沙赫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历史时刻之后继续通货膨胀政策将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没有能力进口军事工业本身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为了避免随后的恶性循环,即军事工业的发展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德国必须不惜代价地利用供其使用的原材料来生产所需的商品(尤其是橡胶)。提姆·梅森(Tim Mason)写道:“如果不能降低重整军备的规模,避免1936年外贸危机再次出现的唯一方式就是大量增加原材料的国内生产。”<sup>①</sup>但是,原材料生产的强制性增长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负债。国家准备不计代价地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损失的原材料:因此军备政策要求化学工业中新的分支机构强制性发展。但是还不仅仅是这样,它还要求传统原材料不盈利生产。军事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必须通过内部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因为没有能力出口导致货币赤字。因此,打个比方,纳粹要使用一种铁矿石,而这使得生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

<sup>①</sup> Tim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9, p. 178.

出几倍。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工厂最初就是为了处理这种在经济上不可利用的贫铁矿而建立起来的。

尽管奉亚尔马·沙赫特为经济领袖的赫尔曼·戈林在经济问题上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他遵循的政策对备战需求始终坚持和专门推崇的态度。经济合理性的要求被取消了。

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政策呢?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使在历史角度上它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资本家个人也不可能被迫“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即美国方式;比起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资本家个人自然更倾向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除了危机情况),罗斯福本人就是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后才成功的。但是在德国情况完全不同。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垄断资本家集团仅仅干预经济和社会政策,将国内外政治中的所有关键位置都交给纳粹党人,而纳粹党人在1936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经济政策领域反对他们了。因为他们在纳粹政权的前几年就自愿地退出政治,所以后来甚至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在1936年,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反对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了,这些人从1933年开始因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而备受欢迎。国防军在1933年时还是中立的和弱小的,但到1936年它已经变得强大时,其大多数的领导者都对纳粹党人非常友好,这一事实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因此默许了政权的军备政策,自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种政策的灾难性质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很清楚的,他们意识到,军备生产的快速增长可能在德国有把握获得胜利之前就会迫使战争爆发(实际上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资产阶级同样默许了这种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直接符合其物质利益,至少就最大的工业部门而言是这样。

从这一刻起,作为一个能够直接代表自身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了。经济决策权掌握在纳粹领导人手中,国家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客户。作为结果,各个资本家团体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不是为了自由市场(这是非常受限制的),而是为了国家的订单。失败者是那些不能转向军工生产的资本家,即日用消费品产业中的资本家。所有从国家那里获得订单的资本家都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国家准备不计代价地提高军备生产的速度。自然,化学工业的新兴分支获得了最多的利润,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各种资本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纳粹掌权之前,钢铁工业一直是德国资本的领导阶层,从1933年开始,化学工业变得同样重要。因此,纳粹的纲领在德国工业结构中引起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今天德国在经济方面成为欧洲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用迪特尔·格罗塞尔(Dieter Grosser)的话说:“联邦共和国的许多大企业的经济权力来源于军备时期和战争经济。”<sup>①</sup>

因此,即使有些资本家集团因为纳粹政权不加节制的军备政策而损失了直接物质利益,但这种政策并没有妨碍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直接利益。他们的收入实质上增加了。格罗塞尔指出,1936年以后,工业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家收入或从业者创造的收入。<sup>②</sup> 资产阶级欣然放弃对政治的干预,这是因为失去政治权力会带来经济权力的极大增强,无论如何,资本家个人或资本家群体在企业 and 经济领域内仍

---

<sup>①</sup> Dieter Gross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 In *Das Argument*, no. 1, 1965, second edition 1967, p. 6.

<sup>②</sup> Dieter Gross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 In *Das Argument*, no. 1, 1965, second edition 1967, p. 5.

然具有无限权力。但是,整个资本的一般利益并没有得到维护或实现。更确切地说,纳粹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从历史角度来看并没有形成符合资产阶级根本的集体性利益的结构——即它不符合集约发展阶段的稳定机制的形态。除了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的利益之外,在这种经济框架内能够实现的利益是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的一部分资本家群体的利益。提姆·梅森说:

资本主义竞争特点中的这种激烈化和改变总体上进一步促使工业界政治权力的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集体利益从1936年到1939年逐渐消失,仅仅变成单独企业短期利益的聚集。<sup>①</sup>

国家干预政策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中的作用比在现代操控性的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后一种情况中,国家干预<sup>121</sup>在本质上意味着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而对特殊的资本家集团相互矛盾的利益进行平衡和调解,而法西斯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则是不同的。在对资本家私人利益进行调节时,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不是由经济领域的利益决定的:这些政策恰恰是以利用这些私营资本家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政权通过以下方式维护纳粹领导阶级的政治利益,即在经济领域,它促进资本主义竞争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自然地发挥作用。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了,与其成员独立于大资本家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相比,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对资本家个人实现其日常利益限制得更多。但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新政比法西斯主义更为清楚地代表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于资本家的日常利益并因此走上毁灭之路,法西斯主义主要代表的是具有统

<sup>①</sup> Tim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9, p. 181.

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权力利益。

1936年的转折点纯粹由政治领导阶层的政治利益决定。提姆·梅森正确地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由此产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政治超越经济整体利益的绝对主导地位被确立下来。我们已经看到,政治明确地促进了私人经济利益的实现这一事实使这种主导地位的确立更加容易。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可以阻碍资产阶级集体利益的实现,因为它同时为资产阶级的一些十分重要的部分提供了获取空前利润的机会。

然而,政治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必须一直使用强力将其要求强加给经济。转折点意味着经济本身的重新调整,一旦开始重新调整,它本身的自我运动就会驱使它满足政治的需要。安杰洛·塔斯科在1936年写了如下评论(可能有些夸张,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称为“法西斯主义经济”):

法西斯主义经济是一种指向战争的、“计划的和封闭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产成本、竞争(对国民经济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于个人私有企业并非如此——米哈伊·瓦伊达),甚至利润本身通常都不起决定作用。筹备战争这一政治目标比所有经济方面的考虑都重要,相应的经济组织就其本身而言只能服务于这一目标……在法西斯主义中,国家不仅取代私营资本家成为经济的组织者,而且将自己的政治计划作为重中之重强加给私营资本家。法西斯主义特有的势力范围是政权,而不是利益。<sup>①</sup>

<sup>①</sup>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 350.

虽然我不能同意政权和利润之间这种过于严格的对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但我认为塔斯科明确地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经济组织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改变得无法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

1936年采用的资源管理上的这种浪费的形式完全忽视了经济合理性的要求,其结果是,国家债务增长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步。它在德国国民经济中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唯一的出路——按字面意思——是通过抢劫和奴役劳动拯救经济的掠夺性战争。1936年采取的经济管理形式使战争成为必然,洗劫所占领的领土以及转移并奴役这些领土上的人口却不为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必需品也成为一种直接的必然。

甚至对纳粹政权最残忍的和种族灭绝的手段,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归因于其领导者的施虐狂或“疯狂”。这个政权自诞生起为了生存就需要这些手段。历史上“通常的”战争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实现一些具体的目标而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除了战争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

为了进行这些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为这种政权本身性质的必然结果的可怕暴行,需要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基础”。人不可能以经济利益或集团的权力利益的名义消灭数以百万计的人。那些被奴役、被榨干最后一点儿劳动能力,然后被消灭的人必须被“证明”是下等的甚至完全非人的。仅仅有“服从命令”这一个普鲁士的原则还不能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变成虐待狂般的大肆杀戮者。因为很明显这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不可避免的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某些非常理性的罪恶必然伴随着非理性的暴行,不仅在表

面上,实际上更是如此。如果犹太人和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应该被驱逐出境,不是因为纳粹集团必须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而继续进行无情的经济剥削和掠夺性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防止下等种族的扩散,那么接下来那些不具有可利用劳动能力的人也应该被驱逐出境。如果这种行动是为了“更高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的执行有时必须违背冷静的思考。如果纳粹党卫军的建立就是为了消灭这些牺牲者,因为他们不算是人类,那么即便是在需要停止这种灭绝行为的时候也没有合理的理由作为依据来阻止他们了。如果对这些人的灭绝行为是为了“更高阶的”目标,那么它就不可能因为“低级的”物质利益而被停止。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种非理性出现的方式。当德国工业需要在某些行业雇用波兰优秀技术工人并由此需要支付给他们正常的工资(尽管比德国工人的工资要低)、将他们作为“自由”人对待(如果“自由”这个词可以用于第三帝国)时,纳粹党卫军也要反对。德国工业急需的数以千计的波兰技术工人被驱逐出境,被强迫像奴隶一样工作,并最终遭到杀害。再举一个例子,德国军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遇到了严重的供应困难,按照“合理性”的要求,所有的铁路和机车似乎都应该被用于服务前线。但它们反而被用于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犹太人运往死亡集中营,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立即被毒气毒杀,因为即便把他们留下来像奴隶那样工作也是不“经济的”。

因此,服务于政权理性目标的意识形态无疑在许多情况下变得非理性,并违背它的“切身利益”。但是这最终仅仅表明并透露了政权整体上根本的非理性。我完全同意提姆·梅森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总是存在一些坚持政

治主导地位的非理性的东西,因为能够独自证明这种主导地位合法性的东西,即共和国,只能是伪造的。<sup>①</sup>

将国家渲染为完全独立的事物(这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意味着这种政权必然会消灭自身。这不是因为行政权力与资本主义利益相冲突,而是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从所有制度上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行政权力服务于无视一切合理性原则的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它还同时服务于因竞争胜利而出现的私营资本家利益。后一种情况与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垮台无关。从经济角度来看,德国在二战中惊人的失败仅仅是纳粹领导阶层的失败,而不是德国垄断资本的失败。德国“经济奇迹”的存在要归功于法西斯主义经济政策忽略了“理性”(reason)原则这一事实,而不是马歇尔计划。

在纳粹时期,德国统治阶级被改变了吗?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了吗?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阐释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答案。共产国际的官方理论家和许多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否定意义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另外,他们都否认法西斯主义除了资产阶级上层之外还代表任何其他人的利益。例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托·鲍尔尤其强调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起源,他坚持认为,“即使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起源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它的建立和稳定也终结了这种平衡”<sup>②</sup>。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是他还得出如下结论:

资产阶级的领导阶层,即垄断资本和大庄园主

---

<sup>①</sup> Tim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9, p. 193.

<sup>②</sup> Bauer, *Der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156.

125 的代表,在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建立之后,成功地以非凡的速度把这种新政权变成他们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把新的主人变成他们的仆人……即便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统治资产阶级,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资产阶级需求、利益和**意志**的执行机构(我标注的加重——瓦伊达)。<sup>①</sup>

我认为鲍尔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政权统治某个阶级的话,它又怎么会执行这个阶级的意志呢?一个权力系统怎么会统治它所实际服务的人呢?“需求”、“利益”和“意志”不可能自动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我试图表述清楚,虽然法西斯主义在很多方面符合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但它不符合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志。鲍尔的观点以及共产国际的官方观点都是以统治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图式为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学派的共同特征。它假定,经济权力也**自动**赋予一个阶级政治统治的所有权,阶级利益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体现,我们所讨论的阶级自动地或以某种方法赋予这种方式以意志。阶级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阶级联盟的关系)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合法的所有权——所有其他因素,特别是谁控制生产关系的问题,被认为是次要的。

但是,相反的观点仍然是一种简单化。比如,当安杰洛·塔斯科<sup>②</sup>宣称法西斯主义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集团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时——一个没有在经济中占据特定位置但

<sup>①</sup> Bauer, *Der Faschismus*, In Bauer, Marcuse, Rosenberg et al.,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nd Vienna, 1967, p. 157.

<sup>②</sup> Tasca (pseud.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p. 351.

资产阶级必须与之妥协的阶级——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一政权的受益人并不一定形成一个阶级，恰恰因为一旦他们失去政治权力就无法保证其经济特权。如果一个社会阶层因拥有政治权力而享受物质特权，那么它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阶级。

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符合资产阶级的直接物质利益，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仍然会与某些特定的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其统治违背了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为另一个阶层的利益服务，这个阶层拥有的政治权力使它在既定政权的框架内能够获得物质好处。因此，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通常只为资产阶级上层或统治阶级服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毫不犹豫地各个方面服务于这些利益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政权的受益者却不属于占领导地位的经济阶级，他们所享有的社会特权与其政治形式密切相关；因此，尽管法西斯主义领导阶层不属于资产阶级，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法西斯主义领导阶层拥有经济权力并不能成为反驳这一说法的理由。不可否认它拥有这种权力——不是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而是在国民经济层面上。由于这种政权的结构，其领导性的政治地位使它能够指导经济（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版本的“十二月十日会”所扮演的角色与波拿巴的社会完全不同）。但是，这与我所说的法西斯主义领导阶层不是一个阶级并不矛盾，因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经济权力并非来源于受其自发规律支配的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角色。当他们失去政治权力的时候，经济就会自动地转换到真正符合集约型发展阶段要求的轨道上，这也自然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经济权力的终结。

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法西斯主义

领导者,或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获取了大量的私人财产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资本,即可继承的资本。我不是在谈论戈林,他是一个特殊情况:他成为德国一家最大企业的拥有者,但是只有在他是这个政权的领导人物之一时他才能保持这种所有权。我是在谈论一种明显私人性质的财富积累。这些财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个政权垮台后仍然掌握在一些前纳粹领导者手中。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如果纳粹领导者成为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的拥有者,那么他们也仅仅是变成了资本家并以个人身份融入最初的资产阶级而已。因为资产阶级的成员资格从来就不是一种此前社会的阶级联盟那样的“自然给定的”情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日常事件,并不代表一个新阶级的出现。<sup>127</sup>

那么,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更改我所说过的话了。除资产阶级上层之外,这个政权的另一个受益者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但是这个阶层的利益是与其政治权力相关联的,我们对“经典”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质”的描述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纳粹主义几乎迫使整个人类陷入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需要付出令人恐惧的牺牲。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政权的崩溃。纳粹主义离开了历史的舞台,只有它的幽灵还到处复现。它是不可能幸存的。它的存在必定是暂时的。适于资本主义粗放型发展阶段的社会制度所爆发的危机并不需要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哪怕是作为暂时的必需:法西斯的出现只是因为这一危机符合德国十分特殊的政治形势。

然而,这一论点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补充。它需要研究法西斯主义运动为什么完全没有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巨大成功:因为即使它不能在其他地方实现真正的大规模效应,它也肯定存在于意大利和德国之外。为什么这

是一个首要问题呢？因为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没有成功，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能够切换到具有民主形式的新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德国的成功、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侵略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所有这些都不可否认地造就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摆脱危机的能力。德国迫使这些国家转向战争经济。提出如果德国历史没有这样发展将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回答下列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法西斯主义。

纳粹德国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在现代新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世界大战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起适合这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社会体制？<sup>128</sup>

## 主要译名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 Adornod,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32  
 Bauer, Otto 奥托·鲍尔 14, 72, 124 - 125  
 Bismarck 俾斯麦 69, 99  
 Borkenau, Franz 弗兰兹·博克瑙 63  
 Brüning 布吕宁 85, 95, 102  
 Darré, Walter 沃尔特·达雷 19, 88  
 Engels, Frederick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9  
 Fetscher, Iring 伊林·费切尔 94  
 Franco, General 佛朗哥 14  
 Fromm, Erich 艾瑞克·弗洛姆 32, 40  
 Giolitti, Giovanni 乔瓦尼·焦利蒂 63 - 64  
 Gö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118, 126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29, 43,  
 44, 63 - 64  
 Gripenburg, R. R. 格里彭堡 103  
 Grosser, Dieter 迪特尔·格罗塞尔 120  
 Harich, Wolfgang 沃尔夫冈·哈里希 19

- Heller, Agnes 阿格妮丝·赫勒 33, 40
- Heller, Hermann 赫尔曼·赫勒 51 - 54, 93
-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希法亭 58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5, 62, 75, 76, 85 - 89, 95, 104 - 106, 109, 111 - 112, 116 - 117
- Horkheimer, Max 马克斯·霍克海默 93
- Horthy, Admiral 霍尔蒂 13, 14
- Jánossy, Ferenc 费伦茨·亚诺希 60
- Justus, Pál 帕尔·尤斯图斯 18, 112
-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58
- Korsch, Karl 卡尔·柯尔施 18, 56 - 57, 66, 74
- Lenin, V. I.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58
- Lukács, Georg 格奥尔格·卢卡奇 7 - 9, 17 - 18, 37, 76 - 80
-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58
-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16, 17, 18, 19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7, 8, 17, 21, 22, 23, 38, 75, 94, 95 - 96, 98 - 99, 101 - 103, 107
- Mason, Tim 提姆·梅森 111, 118, 120, 121, 124
-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52, 62, 65, 77, 104, 105 - 106, 107
- Napoleon I 拿破仑 95
-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19
- Papen 巴本 95, 102
- Pareto, Vilfredo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52
- Pilsudski 毕苏茨基 14
- Reich, Wilhelm 威廉·赖希 32, 33
- Roosevelt, Franklin 富兰克林·罗斯福 61, 82, 85,

113, 115, 116, 119, 127

Schacht, Hjalmar 亚尔马·沙赫特 112 - 113, 114, 116, 118

Silone, Ignazio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 72, 73

Sorel, G. 乔治·索雷尔 52

Strasser, Otto 奥托·施特拉塞尔 88

Tasca, Angelo 安杰洛·塔斯科 47, 48, 95, 121 - 122, 125

Thalheimer, August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 94 - 95, 102, 103

Tjaden, K. H. K. H. 恰登 103

Trotsky, Leon 列夫·托洛茨基 53, 69 - 71, 73, 76, 95, 102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17

Zetkin, Clara 克拉拉·蔡特金 14